

红旗

HONGQ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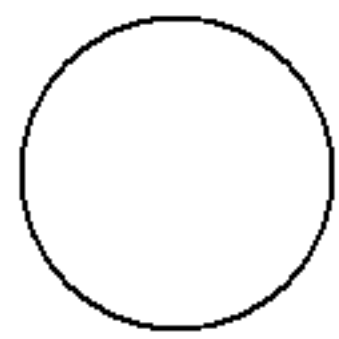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二年 3·4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一期 ★

目 录

社 論	鼓足干劲, 争取社会主义 建设的新的胜利	(1)
	欢呼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胜利	郭济洲 (6)
	当“败狗”翘起尾巴的时候	袁先祿 (15)
	现代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哲学	陈元暉 (18)
	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权威问题	海波 (27)
	做好人民公社的财务工作	朱光福 (32)
	关于戏曲老艺人的艺术经验	曲六乙 (36)

☆ 一月一日出版 ☆





加强党的战斗力

共产党是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是因为它具有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革命、最科学的思想理论武器，因为它是由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因为它同自己阶级的广大群众和其他一切被压迫的、要求革命的人民群众建立了最密切的联系，并且最彻底地代表了他们的利益。这样的党不仅能够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战胜反动派，夺取政权，而且能够在取得政权以后，继续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同一切老修正主义者一样，竭力降低无产阶级政党的水平。他们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替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党的组织变成一般的群众政治团体。他们实际上是要使共产党由于丧失自己的全部战斗力，而蜕化为向资产阶级投降的社会民主党。

中国共产党在它诞生的时候，就是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贯地坚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一贯地同一切降低党的水平，削弱党的战斗力的倾向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战斗的历史。在开始领导革命的时候，我们党的力量是很小的，而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却是强大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走过了曲折复杂的道路，英勇地克服了重重困难，机智地绕过了无数暗礁，经过了二十八年的斗争，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绩。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我们党不是一个具有英勇战斗精神的党，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比起革命事业来，甚至是一个更加艰巨复杂的任务。在革



命中，在对敌斗争中，需要不断地加强党的战斗力，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有些人觉得，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加强党的战斗力，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了。这种想法，无疑是错误的。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团结全国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全国总人口中占百分之九十几，他们都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在我国总人口中只占百分之几。但是，不能认为，这百分之九十几的各阶级、阶层的人是自发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也不能认为那百分之几的人在任何情形下不会扩大他们的影响。很明显的，在这里，必须有一个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才能真正把这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团结起来，把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动员起来，从而使那百分之几的人彻底孤立，使他们不能乱说乱动，并且强迫他们改造。我们党的战斗力越强，就越能紧密地团结全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这是符合于全国人民的愿望的。

我们的任务是要使一个具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根本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很长时期的斗争。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必然要克服许多困难，要解决许多复杂的问题，要经历各种曲折的道路。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我们党能够成为人民群众中的不可缺少的领导核心，就因为我们党既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智慧，又具有无产阶级的最坚韧的斗志。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曾经这样说：“我们一定用全副精力来进行这一工作。有耐心，能坚持，有决心，有决断，善于反复试验、反复改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无产阶级的这些品质就是无产阶级一定胜利的保证。”^①这段话对于我国当然也是完全适用的。

在革命斗争中，敌人常常用他们的行动向我们发出警告，提醒我们必须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也还有阶级斗争，但是，我们生活在和平环境中，我们党已处于执政党的地位，这种情形很容易使人思想麻痹。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经常注意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要求，经常注意提醒自己，把不断地加强党的战斗力当做十分重要的事情。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并且形成了一套

^① 《从破坏历来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6页。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風。这是我們党的优良傳統。我們必須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发揚这些傳統。經過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十二年的努力，我們党已經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設的初步經驗，已經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并且正在逐步制定为貫徹执行这条总路綫所必要的各项具体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更好地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进一步改进我們的工作作風，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

加強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是同提高党的战斗力密切相关的。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党员个人必須服从組織，少数必須服从多数，下級必須服从上級，全党必須服从中央。一切党员和党的組織，都要自觉地无条件地維護党的集中統一，执行党的決議，遵守党的紀律。任何忽視党的紀律的現象都会給党造成巨大的危害。列宁曾經指出：“誰要是把无产階級政党的铁的紀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別是在无产階級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資产階級，反对无产階級。”^①社会主义經濟是計劃經濟，它要求高度的集中和統一。任何妨碍党的集中統一的分散主义行为，党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的任何松懈，都会使党涣散无力，都会損害社会主义建設事业。

党的集中統一是在民主的基础上的。这就是毛澤东同志所指出的：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脱离了党的集中领导的极端民主，会損害党的利益，是无产階級所不需要的。同时，只有在民主基础上，把群众的智慧、力量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才能形成真正的集中。也只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紀律，才会成为群众自觉的紀律。沒有民主基础的集中，必然造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不以民主为基础的紀律，也不可能是巩固的紀律。因此，在我們党内，广泛地发揚民主，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并不是同加強組織性、紀律性相矛盾的，而恰恰是后者的必要条件。毛澤东同志說，我們的思想，我們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也应该打扫和洗滌。“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广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无則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②深入地正确地开展批評与自我批評，充分发揚民主，会更有利于党的集中統一，有利于加強党的战斗力。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頁。

② 毛澤东：《論联合政府》。《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97頁。



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力，必须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和群众路线的作风。我们要做好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努力认识并掌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不这样做，就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实事求是的重要关键又在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工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才会有力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党的各个领导机关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各级党委的负责人，应当认真地调查一两个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以便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于指导一般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又总是要求一切党员干部必须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不是对群众的利害漠不关心，而是密切地关心群众的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而是把党所提出的政策和任务详细地向群众交代清楚，在群众中做细致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每一个党组织都应当按照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要求，注意建立经常工作，在经常工作中积累经验，联系群众，而不应当抛弃这种经常工作，只热衷于某些突击工作。这种扎扎实实的、密切联系群众的经常工作，乃是党的巨大战斗力的源泉。

由于我们全党绝大部分党组织和党员，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坚持了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和方法，使我们的工作由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有些同志没有把工作做好，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党的这些优良传统。他们往往以主观想像代替调查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以个人的意见代替群众的意见，以华而不实的作风代替深入细致的作风。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使工作速度加快”，这就是“战斗性”，其结果恰恰相反，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那就只能是削弱党的战斗力，给工作造成损失。这种错误做法是必须克服的。

我们的党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我们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我们的许多老干部经历过战争和革命烈火的锻炼，许多年轻的干部在党的优良传统的影响下，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成长起来。我们的党是一个符合于人民需要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全党认真彻底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进一步加强党的战斗力，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使我们党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取得更大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

李 維 漢

本文分以下五个问题来谈：

- 一、争取领导权的两重斗争；
- 二、正确地区分敌友，率领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
- 三、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利用矛盾，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
- 四、区分主要同盟者和非主要同盟者，依靠工农联盟，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
- 五、区分领导者和同盟者，发展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力量，把同盟者提高到当前革命纲领的水平。

一 争取领导权的两重斗争

领导权问题，是革命统一战线最根本的问题。哪一个阶级掌握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就决定了革命走那一条道路，从而也就决定了革命的成败，以至革命的前途。

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唯一能够走得通的康庄大道。中国人民已经胜利地走过了这条道路。中国人民所以能够胜利地走过这条道路，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争取了最广泛的同盟者，实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中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从阶级关系上讲，带有两重性质，表现为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 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经过这个联盟，争取和实现工人阶级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领导。一个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经过这个联盟，争取和实现工人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的领导。在这两个联盟中，工农联盟是基本的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工农联盟愈巩固、愈强大，就愈有力量去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 其他劳动人民，其中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本文所称城市小资产阶级，一律指独立工商业者，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和广大青年学生。

** 本文所称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以及它们的知识分子。



和其他爱国分子，就愈有力量去孤立和分化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愈有可靠的保障。所以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从基本上说来，就是争取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壮大和巩固工农联盟的问题。这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只能是非基本的、辅助的联盟；但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又是一个重要的联盟。工人阶级必须积极争取这个非基本的联盟，才能掌握全部的领导权，而使工农联盟获得辅助力量，使大资产阶级完全陷于孤立，使革命的胜利获得完全的保障。中国革命的经验充分证明，工人阶级必须在巩固和壮大工农联盟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团结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才能有强大的和完全的领导权，使敌人完全孤立，取得革命的胜利。

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既同大资产阶级代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作斗争，又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道路作斗争的过程。而同旧民主主义道路的斗争，归根到底，也是同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的斗争（这一点，后面还会加以论述）。

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道路作斗争，主要是为了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时也是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如同我们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具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①。事情很明显，或者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善于带领和教育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帮助他们脱离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影响，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这样，就在政治上取得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或者相反，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不善于带领和教育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至不能帮助他们脱离民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样，就在政治上让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而使工人阶级被迫处于孤立地位。

在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爱国的阶级。他们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现代工业，形成了民族市场，同时传播了资本主义的文化，造就了一批新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一个民主革命的政治力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在二十世纪之初，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纲领，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反对和孤立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想，并且举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最后终于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50页。



实现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它的历史意义是伟大的。但是，辛亥革命没有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的和中国的历史条件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尤其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进入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结束了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伟大的孙中山和他的一部分战友，在一九二四年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把国民党改组为民族民主的政治联盟。这是中国国民党本身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它对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人民大革命，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可是，在孙中山逝世以后不久，当工农群众运动广大发展、革命走向深入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就表现了很大的动摇。当革命开始向土地革命发展，北伐军队进到帝国主义势力的生命线长江流域及其心脏上海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终于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就这样，民族资产阶级再一次用自己的行动向中国人民宣告，他们早已完全丧失了革命领导者的资格。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的失败，说明了这条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旧民主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中国革命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只允许他们走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日益成为强大的独立政治力量，它同样不允许中国走旧民主主义道路，而要力争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十分软弱和动摇的阶级，而又处在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你死我活的斗争之间。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矛盾，不愿意中国殖民地化；同时又害怕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获得彻底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人民共和国。所以，在中国进入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他们长期地摇摆于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之间，不能成为真正的独立政治力量，更不能独立地实现其政治主张。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而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却附和了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中华民族处在危急存亡关头，民族资产阶级又转向抗日，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运动。在抗日战争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分子靠拢共产党，右翼分子依附国民党，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则在国民党顽固派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亦即在工人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长期地采取了摇摆不定的中立态度。直到一九四八年，人民革命接近最后胜利，而国民党统治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接近最后崩溃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才开始正式转到人民革命方面来。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它的两重性，使得这个阶级在一九二七年的历史条件下，背离工人阶级，跟随大资产阶级；中间经过长期的中立和动摇，到一九四八年以后，在另



一种历史条件下，轉到跟随工人阶级。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二六年的論断：

“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民族资产阶级丧失了革命领导者的资格，旧民主主义已经过时了，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天性却驅使他們长期地固执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要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因此，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就在统一战线内部和外部，长期地存在着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存在着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幻想，曾经形成了一条所谓“中间路线”，或者叫做“第三条道路”。在日本投降以后，所谓中间路线，曾经喧嚣一时。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当时，抗日战争既已取得胜利，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课题，就是建国和建什么国的问题。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要在中国继续保持和恢复他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广大人民，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按照当时的具体条件，争取建立一个能够保证中国的独立、民主、自由的各阶级的联合政府，以便逐步过渡到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民族资产阶级，则想使中国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当时，国内的形势是这样：（1）蒋介石集团因为参加抗日，在人民中保有一定的影响；又因为只是消极抗战，并取得美国的援助，保存了反动武装力量；在日本投降后，又接收了大部分日伪军和敌占区，并且继续得到美国的犬量援助，增强了反动武装力量。（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人民解放区，经过八年的英勇抗战，已经空前强大起来，但是还处于分散的状态，还居于相对的劣势。（3）各民主党派，因为参加了抗日战争和民主运动，作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已经形成起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发言权；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为了孤立共产党，又极力拉拢他們，暂时在政治上对他們作了某些让步，如同意他們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允諾他們参加联合政府等等。这种情况，使得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人陷入幻想，认为国民党消灭不了共产党，共产党也消灭不了国民党，中国非搞资产阶级民主不能得救，甚至幻想会获得来自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幫助。他們中的一部分政治代表人物企图站在国共两党之间，一方面利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来逼迫国民党向民族资产阶级让步，开放一些政权，实行一点民主，另一方面又利用国民党来限制人民革命力量，不使这个力量的发展超过他們所允许的范围。有些人甚至以为可以利用国共两党相持不下的局面，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有人就幻想要国共两党都把军队交给他們管理，实行所谓“军队国家化”和“文人掌军”。民族资产阶级的这部分政治人物，就是企图和幻想用这样的办法来达到使中国

^①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5页。



逐渐演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的。

中間路綫或第三条道路，不但一般地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而且在当时条件下，在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中也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在一部分民主党派中更占了上风。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中間路綫具有两面性。中間路綫分子們要求和平、民主，不赞成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这是积极的一面。但是，他們又对国民党蒋介石，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很大的幻想，要求共产党作牺牲人民根本利益和根本陣地的让步，来向国民党换取和平、民主。他們害怕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而在人民群众中散布无原则的和平主义的幻想。他們不仅企图影响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企图影响农民。他們說，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两个极端，都是少数，只有中間路綫能够代表一切处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間的中間阶层，即占全民族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中間路綫不但表现了很大的軟弱性，而且表现了很大的反动性。针对着这种情况，我們党在旧政协期間，一方面积极地团结和带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一道，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在斗争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欺騙；另一方面，对中間路綫分子的妥协性和反动性，則进行耐心的反复的說服和批評。經過这样的又团结又斗争，教育了国民党統治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使他們識破了美蔣所謂和平、民主的画皮；同时也争取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多数，在他們当中增强了左翼力量，縮小了右翼分子的影响。这样，也就打破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欺騙人民、拉攏中間势力、孤立共产党的企图，使美蔣反动派陷于孤立。

随着革命形势和革命力量的发展，中間路綫的积极一面愈来愈縮小，而消极反动一面則愈来愈突出。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人民解放軍由防御轉入进攻，国民党統治区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潮也已經起来。“这是一个历史的轉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轉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統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轉折点。”^①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下令解散民主同盟，其他民主党派也同时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不能在国民党統治区公开活动。各民主党派如果不願意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就只有轉到人民革命方面来，再不能幻想有所謂第三条道路了。同时，在我們党的影响之下，全国許多大城市都公开地进行了批判中間路綫的辯論。所有这些又都推动和帮助了民主党派中的左派的斗争。一九四八年一月，在左派的推动之下，民主同盟在香港举行了三中全会，国民党民主派也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它們和其他民主党派都先后轉到新民主主义方面，都声明反美反蔣。一九四八年五月，我們党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組織沒有反动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迅速地获得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响应。至此，中間路綫已經完全宣告破产。少数右翼分子还不死心，还繼續兜售这种貨色，但这已經不折不扣地成了美

^① 《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43—1244頁。



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用来阻止革命前进、保存反革命势力的反动货色了。是一些什么货色呢？其一，是“新三国”阴谋。这就是妄想由共产党、国民党和各民主党派实行“天下三分”，划区而治，以便阻止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保存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同时乘机捞一把。其二，是组织反对派。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主力已经消灭，人民的一统江山很快就要实现。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看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军事斗争的方法来阻止，他们就一天天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这就是：一方面由国民党政府出面搞“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利用既同革命势力有联系又同反革命势力有联系的某些民主党派的右翼分子，到革命阵营中来组织反对派，配合美蒋的“和平”阴谋，以便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就要尽可能带上温和的色彩，不要过多地侵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中間路綫已经完全破产之后，美蒋反动派却动员他们的御用政客和御用文人，装作所谓自由主义人士，在一九四八年，又唱起“第三条道路”的调子来。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揭破了这种阴谋。毛泽东同志当时指出：“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①

中間路綫，实质上，就是早已过时的和行不通的旧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路綫。它的結局，再一次地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党如果幻想坚持这条路綫，自以为这是以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运动，那他们就必然要落到最不独立的地步，同一九二七年附和蒋介石反革命一样，变成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助手，走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所以，我们批判中間路綫，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进行斗争，归根到底也就是同大资产阶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的斗争。我们党必须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才能帮助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脱离旧民主主义的影响，巩固工农联盟，也才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将革命进行到彻底的胜利。

大资产阶级，因为是一个卖国的阶级，是凶恶的敌人，在人民中不可能有多少威信。但是，大资产阶级从来不放弃其欺骗人民的手段，特别是当革命已经到来，他们不能照旧控制局面的时候，便摇身一变，同革命者讲妥协，甚至混入革命队伍，以便利用革命队伍中的动摇的阶级和人们，从内部破坏革命，夺取革命的果实。所以大资产阶级又是篡夺革命领导权的能手。远在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立宪派，即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就和封建豪绅互相

① 《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82—1383页。



勾結，以各省諮議局为陣地，利用革命派的軟弱性，在半路上篡夺了革命的領導，以致这次革命的結局，政权落到了資產階級立宪派和封建地主階級手中。在这个基础上，袁世凱窃国得以成功。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期間，大資產階級以蔣介石为工具，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并且利用中国共产党內陈独秀右傾机会主义的統治，篡夺了北伐战争的領導权，把中国拖到了絕境。在抗日战争时期，以蔣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不但积极地拉攏民族資產階級，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农民进行欺騙，而且竭力限制进步势力的发展，力求削弱工人階級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独立性，以便夺取抗日战争的領導权，作为对日投降、对内分裂的准备。只是因为我們党在毛澤东同志领导下，采取了正确的路綫和政策，大大地发展了进步势力，爭取了中間势力的多数，并同頑固派进行了針鋒相对的斗争，大資產階級的这种企图才沒有得逞。

为什么大資產階級在历史上能够一再篡夺革命領導权，破坏革命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比較重要的有下列几点。

第一，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爭夺中国的矛盾，以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某些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集团，在一定时期內，往往以某种革命的姿态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参加反对某一个或某一派帝国主义和国内另一派反动势力的斗争。例如：辛亥革命期間，資產階級立宪派参加收回权利运动以至附和反清运动；辛亥革命以后南方的某些大資產階級分子参加孙中山反对袁世凱和北洋軍閥的斗争，以及后来参加北伐战争；蔣介石集团参加抗日战争，等等。这使得他們有可能从內部篡夺領導权，破坏革命。

第二，中国資產階級分化为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不是一次完成的；它們之間的界限不是絕对的，而是常常有新的分化。这种分化过程，随着政治和經濟的发展，經過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實踐，逐步地显露出来。偉大的五四运动揭露了北洋軍閥統治中的买办階級；五四运动以后揭露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分化，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投入了大資產階級的怀抱；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上海工商界分化为大資產階級掌握的总商会和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各馬路商界联合会；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国民党的叛变，更是一次明显的分化。就国民党說，这一次叛变，把继承孙中山革命政策的民主派压下去，而使这个有光荣革命历史的政党，变成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动統治的工具。所以，中国資產階級分化为大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人处在两部分資產階級之間，并且由这一部分轉到另一部分，人民一时摸不清他們的底細，所以容易被他們蒙混过去。

第三，大資產階級的統治是有两手的：一手暴力鎮压，一手政治欺騙。蔣介石在这两个方面，可以說是集大成者。他把反动的武装力量发展到空前的地步，在統治中国的二十二年間，就打了十几年反革命內战。同时，他又耍了許多政治欺騙，特别是在人民革命力量强大或者他自己的統治发生危机的时候。一九二七年以后，蔣介石彻头彻尾地背叛了孙中山的主



張和事业；但是他在表面上，始終把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旗帜抓在手里，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的继承人。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卖国政策的怒潮，蔣介石見人民怒潮难当，宣布“下野”；一旦避过了風头，又重新上台，再把人民运动镇压下去。抗日战争时期，蔣介石为了維持大地主大資產阶级的一党专政，在表面上站在国内各阶级矛盾之上，口口声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把自己装扮成“民族领袖”；但实际上却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日本一投降，蔣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就下定决心并且积极地准备发动大规模反革命内战；但是他又假情假意地連发三个电报，邀請毛澤东同志去重庆談判，表现得那么“迫切”，随后还和我们一道开了政治协商會議，达成了一些協議。一九四六年下半年，蔣介石实际上已經发动了全面内战，但是同时又演出改組国民党政府的把戏，企图把中間势力拉过去。淮海战役以后，蔣介石統治眼看就要复灭，他又重演“下野”和“和平”談判的故技。蔣介石这一套欺騙做法，在沒有被彻底揭穿以前，确实能够欺騙一些人，尤其能够吸引民族資產阶级中的許多人和城市小資產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使他們对他存有幻想。

大資產阶级在施行政治欺騙方面，还有帝国主义撑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历来也是采取武力进攻和政治欺騙两手。英、美帝国主义就是政治欺騙的老手。英帝国主义不但首先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門，而且在一九二七年用分化革命陣綫的办法，策动了蔣介石的叛变。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更加注重文化和精神方面的侵略，它在中国办了許多学校、医院和教会，吸收了許多中国留学生。就是政治上，美帝国主义也善于把侵略說成是友誼。后起的美帝国主义，为了取得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同等侵略中国的权利，提出“門戶开放、利益均沾”的政策，口口声声說是“尊重中国行政和領土的完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了对付日本，也为了扶植走狗蔣介石，以便在战后独占中国，它給了国民党政府一些錢，但它却大肆宣傳，把这說成是“援助中国抗战”的恩惠。美帝国主义的这些活动和宣傳，并不是沒有效果的。在一部分中国人民中，尤其是許多知識分子中，曾經造成了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这种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投降后的一段时间，曾經发展到最高峰。正是仗恃着这种影响，美帝国主义在日本投降后，进行了所謂調停国共两党的活动，企图欺騙中国人民，軟化中国共产党，帮助蔣介石不战而統治全中国。这个把戏沒有能够欺騙中国共产党，但在当时，确实有許多中間人士受了騙。

第四，帝国主义和中国大資產阶级的欺騙做法，在中国人民中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主要就是民族資產阶级和其他中間势力。他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又有联系和依賴的一面。正是这些人，曾經对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英美帝国主义，存有很多幻想。民族資產阶级参加抗日运动和抗日战争，一般是比较积极的，但是許多人却抱有濃厚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民族資產阶级的多数不滿意蔣介石的反动独裁，但是許多人又不願拋棄对蔣介石的幻想，更不願根本推翻国民党反动統治。至于土地制度的彻



底改革，那更是許多人不贊成的，因為他們同封建土地制度有密切的聯繫。所以，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九年《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還着重指出，國內外反動派給予中國人民的影響，“現在還是很大的，並將在長時期內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滅”^①。

以上幾點說明了，工人階級為要爭取和鞏固自己的領導權，特別是為了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人士，不僅要同民族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道路進行堅決的鬥爭，更必須同大資產階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進行堅決的鬥爭，徹底地揭露和打除其反動影響。

工人階級對於大資產階級，根本地說，不可能有領導權，因為他們是革命的敵人。即使在某種歷史條件下，大資產階級暫時參加到統一戰線中來（如蔣介石集團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同工人階級之間，仍然存在著尖銳的對立。這個時候，只有工人階級和共產黨採取正確的政策，進行堅決的鬥爭，才能夠孤立他們，逼迫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就範。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逼迫蔣介石留在抗日統一戰線之內，直到日本投降為止，就是一個範例。就這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種領導作用。

關於爭取領導權的鬥爭，說到這裡為止。下面，我們將從四個方面，來研究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經驗。這四個方面就是：正確地區分敵友，率領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並且一步一步地取得勝利；區分主要敵人和非主要敵人，利用矛盾，集中力量反對主要敵人；區分主要同盟者和非主要同盟者，依靠工農聯盟，團結城市小資產階級，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分子；區分領導者和同盟者，發展工人階級的獨立政治力量，把同盟者提高到當前革命綱領的水平。

二 正確地區分敵友，率領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敵人 進行堅決的鬥爭，並且一步一步地取得勝利

毛澤東同志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一開頭就這樣指出：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②

首先要正確地區分敵友，認清敵人，確定革命對象。

中國民主革命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個命題，是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逐漸明確、逐漸完備起來的。

^①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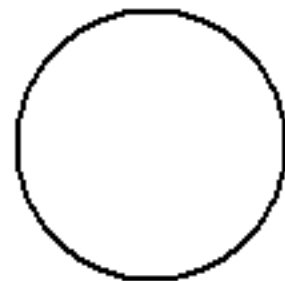
^②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頁。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基本的任务。这个革命，早在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就开始了。但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整个时期中，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辛亥革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孙中山和他的战友在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民主革命必须是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孙中山虽然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但是在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前，不能在人民斗争的基础上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向前发展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事业。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这两个口号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代表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因此，能够动员和团结最大多数人民进行长期的持久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这样明确地和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和纲领，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数十年如一日地高举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大旗，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共产党就能够贯彻始终地把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

如上所述，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大资产阶级，依附帝国主义和勾结封建势力，属于民主革命的对象；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有革命性一面，又有妥协性一面，是能够参加民主革命的动摇的同盟者。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能否正确地地区分资产阶级的这两个部分，对于分清敌友，对于革命的胜败，对于领导权的得失，都具有严重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五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以前，由于政治经验不足，尤其是由于某几个时期中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很多时候都没有能够正确地地区分资产阶级的这两个部分。右倾机会主义者笼统地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力量。“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反对整个资产阶级，把民族资产阶级也当成革命对象，并且强调反对富农。毛泽东同志区分了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把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作为三大敌人，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完整的革命口号。关于富农，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旧式富农一般地带着封建和半封建性质的剥削，对于旧式富农的这种封建和半封建性质的剥削是应当消灭的，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废除富农经济，不应当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这样，毛泽东同志就完全正确地解决了团结谁和反对谁这一决定革命胜负的首要问题，给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

正确地地区分敌友，确定了革命的对象和目标之后，党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率领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工人阶级要实现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就必须自己最坚决最勇敢，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头；就必须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决不可把民主革命看作资产阶级的事情，袖手旁观，或者甘心充当资产阶级的助手和苦力。同时，工人阶级决不可孤军作战，而必须善于争取和率领同盟者一道，去向敌人作斗争。并且必须正确地掌握战略和策略，逐步地取得胜利，才能巩固群众的斗志和信心，争取最广泛的



同盟者，把革命一步一步地推向前进。

根据中国革命的經驗，为要在同敌人斗争中取得胜利，第一必須在战略上藐視敌人，在策略上和战术上重視敌人；第二必須熟悉一切斗争形式，尤其要善于掌握武装斗争和非武装的政治斗争两手；第三必須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和瓦解敌人。这几点是我們党同敌人作斗争的重要經驗。如果我們党不是这样正确地进行对敌斗争，也就不可能把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争取过来。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澤东同志曾經反复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異常强大的，敌人对革命的镇压是极为残酷的，中国革命必須經過长期的和残酷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革命力量如果不能在长期的残酷的斗争中鍛炼和發揮自己的頑强性，就不能坚持自己的陣地和夺取敌人的陣地，就不能聚积和鍛炼成足以最后战胜敌人的力量。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間就可以組成，中国革命斗争頃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們必須充分地估計到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反对革命急性病和冒險主义傾向。同时，毛澤东同志又反复地指出，敌人的基础是虛弱的，他們內部分崩离析，他們脱离人民，他們已經腐爛，沒有前途。从长远的观点看問題，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动派，而是屬於人民。我們有信心和有把握战胜中国的一切內外敌人，必須反对过高估計敌人力量和害怕敌人的傾向。所謂反动派不能打倒的神話，在我們的队伍中不应当有它的位置。后来毛澤东同志又把这两方面的估計概括起来，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又是真老虎，和在战略上应当藐視敌人，在策略上战术上应当重視敌人的思想。毛澤东同志說：

“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須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紙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們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們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們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①

“如果我們在全体上过高估計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們，不敢胜利，我們就要犯右傾机会主义錯誤。如果我們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問題上，不采取謹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爭取一切应当爭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階級，学生、教員、教授和一般知識分子，一般公務人員，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紳士），我們就要犯‘左’傾机会主义錯誤。”^②

毛澤东同志的这个思想，概括了在中国革命中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成功的經驗，又概括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的錯誤的和失敗的經驗，是这两方面的經驗的綜合。也就是說，它和毛澤东同志的其他思想一样，是在中国革命实践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是在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① 參看《和美国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一文題解。《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0頁。

^②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問題》。《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67—1268頁。



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对革命力量估计不足，不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而是害怕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这是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共同特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陈独秀主义。陈独秀主义者不相信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力量，在革命的紧急关头，被反革命的气焰所吓倒，对于反革命的进攻，不敢率领千百万农民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且幻想用对反动派让步的办法来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结果是更加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也更加助长了同盟者的动摇，使得工人阶级完全丧失了领导权；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陷于孤军作战，败退下来。他们不懂得，“谁想帮助动摇者，自己首先应当不动摇”^①。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是最先进、最富于革命彻底性的阶级和政党，如果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敌人的面前表现退缩和动摇，不敢率领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向敌人作坚决的斗争，那么，处在工人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其他阶级、阶层，就必然更加要动摇，以至离开工人阶级。中国和外国的一切经验证明，只有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敢于率领和依靠可靠的同盟者坚决顶住敌人，并给敌人以打击，才能支持同情的同盟者，坚定动摇的同盟者，而孤立敌人。

另一方面，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左”倾冒险主义，最突出的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王明路线。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在策略上战术上轻视敌人。他们打倒一切，一切斗争，不照顾群众的觉悟，不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特别是不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不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不讲究斗争艺术，不计斗争的后果，所以愈斗争愈孤立，当然也谈不上领导权。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我党的领导经验充分证明了，只有既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又在策略上战术上重视敌人，才能既避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避免“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

为了战胜敌人，还必须善于选择最有利的斗争形式。工人阶级政党必须熟悉一切斗争形式，像列宁所说的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把自己全身都武装起来，以便适应情况的变化，及时地变换斗争形式。斗争形式又有主从之分，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条件下，主从是不同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必须善于抓住当前历史条件下的主要斗争形式，并且把其他的斗争形式同主要的斗争形式适当地配合起来，才能打中敌人的要害，也才能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在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近代中国一切反革命统治，尤其是帝国主义、大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统治，都是武装到了牙齿。而一切从事革命运动的先进人物和团体，从洪秀全到孙中山，也都懂得要拥有武装，都懂得只有革命战争才能解决一切。所以，在中国，在民主革命中，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所

^①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2页。



以，对武装斗争和对军队的领导权，就成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重要部分；对军权和战争领导权的争夺，就成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部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手里没有武装力量，就不能独立地领导人民革命，就不能取得和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而在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就可能随时被资产阶级一脚踢开。这是一个经过革命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我们党是从国内外敌人压迫和同盟者叛变的痛苦教训中，逐渐地认识了真理，并且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完全正确地掌握了真理的。事情的确是，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①。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到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內，对这个真理的认识是很不够的。那时还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意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民众运动，其结果，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篡夺了北伐战争的领导权，一脚踢开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使革命半途而废。而在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仍然有许多同志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直到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内还发生过第二次王明路线。当时被这个路线所影响的地区，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战，不敢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开辟抗日根据地，而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用在帮助国民党抗战上。这样，他们就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而国民党一旦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们就陷于束手无策，不能不遭到严重的打击。

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总的说来，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其他斗争形式都是为着武装斗争的。这不排斥在某个方面，在某个时期，和平的政治斗争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高涨。我们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各方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且主动地争取同蒋介石国民党停战议和。在人民抗日运动和我党的抗日主张影响之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国民党内赞成抗日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在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领导下发动西安事变，拘禁了蒋介石和在西安的国民党高级人员，要求停止内战，进行抗日。西安事变，时人称之为“兵谏”，是一次义举。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则阴谋利用这个事变，组织南京亲日政府，讨伐张、杨，扩大内战，以利于实现日本灭亡中国的阴谋。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同情和支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爱国行动，同时坚持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击破亲日派扩大内战的阴谋。党的政策被张、杨等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所接受，西安事变终于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放弃内战政策，接受人民的要求。这样，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就成为由内战到抗日的转换时局的枢纽。这是毛泽东同志的统一战线思想在历史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关头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接着，自七七事变起，实

^①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34页。



現了对日抗战，展开了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新的和胜利发展的时期。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对外进行和坚持抗日民族战争，我們在国内阶级斗争中，就必须以和平的政治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只有善于进行这种政治斗争，才能在抗日战争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反“武装摩擦”的武装斗争，只是在必要时才使用，并且注意适可而止。不这样，就不利于团结抗日。又如日本投降以后，到一九四六年七月全面内战爆发之前，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而美蒋由于没有作好全面内战的准备，并且迫于广大人民的强烈愿望，暂时不得不打起和平的幌子，作为欺骗人民、准备内战、孤立我們党的手段。因此，在这期间，我們同美蒋反动派的斗争，就是在确保人民已得阵地的前提下，以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这场斗争是争夺人心之战。誰赢了理，誰就获得人心，就能打胜仗；誰輸了理，誰就失去人心，就要打败仗。这场斗争的結局，是我們打了胜仗，而美蒋反动派打了败仗。这次政治斗争的胜利，实际上是在全国广大人民中，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为尔后的解放战争作了政治的、精神的准备。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高涨，主要是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同时也是同这个精神的、政治的准备分不开的。

总之，工人阶级政党要争取和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准备和平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两手，并且熟悉这两手，以便依据情况，确定以哪种斗争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把其他斗争形式同主要斗争形式配合起来，并且善于依据情况的变化，从这一斗争形式转变到另一斗争形式。我們党从长期的曲折的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武装斗争经验，既善于进行武装的军事斗争，又善于进行和平的政治斗争，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领导革命到达胜利。

以上，我們論述了必須在战略上藐視敌人和在策略上战术上重視敌人的經驗，又論述了必須熟悉一切斗争形式，尤其善于掌握武装斗争和非武装的政治斗争两手的經驗。还有一点重要的經驗，即必須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分化和瓦解敌人，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善于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利用矛盾，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这个问题，我們将在下面一节里，单独地加以論述。

三 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利用矛盾，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基本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位一体，成为整个民主革命的对象，一律都要打倒，不能打倒一个，不打倒一个，也不能打倒一部分，不打倒一部分。同时，旧中国又是一个被世界上各主要帝国主义所统治的国家。这样，就使中国人民在革命斗争中面对着以下两种情况：敌人很多、很强大，不可能一次都打倒，只能各个击破。这是一种情况，是敌人的强点。另一方面，各派帝国主义利害又不一致，各扶植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实力集团，相互之间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又一种情况，是敌人的弱点。这后一种情况，常常使敌人的营垒发生冲突和破裂，有利于革命方面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敌人。这后一种情况，又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国人民同各部分敌人之间的矛盾处于不同的地位，有的突出起来，成为主要矛盾，有的暂时退到次要的地位（当然，矛盾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使一部分敌人成为主要敌人，另一部分敌人暂时处于非主要敌人的地位；这又有利于革命方面利用矛盾，首先集中力量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每一次主要矛盾和主要敌人发生变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阵线也随着发生变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动，从而使中国整个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的变化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北洋军阀，又分为以英国为后台的一派，主要在长江流域；以日本为后台的一派，主要在东北和华北。一九二七年，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分化中国革命阵营，以蒋介石为新工具，从内部破坏革命，建立反革命统治，接着进行了十年残酷的反革命内战，造成了中国人民和蒋介石统治之间极端尖锐的矛盾。在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由吞并东北进而要灭亡全中国，使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日本投降以后，美帝国主义代替日本的地位，以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为工具，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又使蒋介石统治和美帝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民主要的敌人。在上述各个时期中，除了当时的主要敌人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则成为当时的非主要敌人。这些非主要敌人，在革命斗争的发展过程中，又分化为几种情况。有些非主要敌人暂时处在中立地位，例如在解放战争时期，英、法帝国主义由于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削弱，无力东顾，而中国又成为美帝国主义独占的势力范围，所以英、法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大体上站在中立的地位。有些非主要敌人转为暂时的同盟者，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还有些非主要敌人则在革命的打击、分化之下，实行倒戈起义，转到革命方面来，成为长期的同盟者。这在解放战争后期达到了不小的规模，又以原来同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为多。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① 必须正确地地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才能正确地确定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中国和外国的革命经验都证明：“革命的主要打击方向应该放在最主要的敌人身上”^②。对于非主要的敌人，则应当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力争中立他们，以至在可能条件下联合他们，同时孤立他们的反动方面，以便集中力量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我们党在毛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14—315页。

②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页。



澤东同志领导下，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正确地解决了区别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反对当前主要敌人的战略、策略问题。当日本帝国主义要吞并全中国，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党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已于一九二七年退出了统一战线），改变为直到包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使它同包括英、美帝国主义在内的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结合起来，以反对当时的最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解放战争时期，美蒋反动派同中国人民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时，我们党通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般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团结广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及其他爱国分子；又通过分别对待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和对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采取有步骤有区别的政策，争取他们之中某些爱国上层分子的起义，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此外还采取了中立英、法帝国主义的政策。这就使我们空前地壮大了革命势力，孤立和瓦解了敌人，从而迅速地打倒了最主要的敌人——美蒋反动派的统治。这样，中国革命的敌人虽然很多很强大，但是直接和我们作战的，在每一个时期，却只有一部分敌人。因此，我们就能够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如果不区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不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当前主要的敌人，那又会产生怎样的局面呢？这我们也有过经验，并且是痛苦的经验。这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所实行的打倒一切的冒险主义政策。尤其是这个时期的王明路线，不仅不区分主要敌人和非主要敌人，甚至把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也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把主要的打击方向对着这种中间势力，结果是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自己陷于孤立。直到党把工农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原来拥护王明路线的同志中，仍然有某些人没有觉悟过来。毛泽东同志对这些同志的关门主义思想作了有力的批判，指出他们“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①。

下面我们专门来考察一下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和蒋介石反动集团合作抗日中所进行的斗争及其主要经验。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49页。



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最主要的部分，是中国人民在国内的最凶恶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要吞并全中国这件事，使这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暂时退居次要敌人的地位，并且在我們党和全国人民的逼迫和争取之下，参加了抗日，成为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右翼顽固派。蒋介石集团拥有统治全中国的政权和几百万军队，代表英美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有主子作后台，当时争取他们，对于停止内战、实现抗日有决定的作用，对于争取英美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也有重要作用。历史证明，当时一切反对联蒋抗日、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见，都是错误的。但是，蒋介石集团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的是控制抗战，限制人民，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以保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后台老板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所以，他们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拥有一部分革命武装和人民政权。党依靠这支革命武装和人民政权，在敌后动员和组织人民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成为整个抗日战争的中心支柱。赖有这个中心支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到最后的胜利。但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和人民政权，在抗战开始的时候还很小，不但在党外，而且在党内，都有一些人看不起它，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这样，两个阶级，两个政党，两支军队：一个坚决抗日，一个消极抗日；一个坚持团结，一个制造分裂；一个依靠人民，实行人民战争，一个反人民，限制人民抗战；一个小且无外援，一个大且有外援。两者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一切中间阶层，中间党派，都鼓起眼睛望着这两个阶级、两个政党、两支军队，注意着他们之间的上述各种对立因素的斗争。在工人阶级、共产党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之间，从来没有存在过和进行过这样鲜明、这样尖锐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胜利谁属？属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才能把抗日战争引导到最后胜利，并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把革命继续向前推进，直到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历史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胜利的取得，经过了八年之久的极其严重和复杂的斗争。从这个斗争中，我们党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基本的和主要的有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实现抗日，我们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又主动地向国民党建议，要求国民党放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实行抗战和民主。在此条件下，我们党保证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将党所领导的人民政权改名为统一国家的特区政府，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我们党并且建议以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作为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另一方面，我们党又始终不渝地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方针。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和反复地说明了这个方针，并且指出这个方针的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战争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毛泽东同志说：

“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路綫，必須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須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則。我們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綱領这个基础上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則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則的說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①

“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脚，……我們的方針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統一，又独立。”^②

这个独立自主的方針，給统一战线的內部关系，規定了一个民主的原則，給发展进步势力，爭取中間势力，孤立頑固势力，提供了一个銳利的武器，也就是給爭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提供了一个銳利的武器。

工人阶级政党在同其他党派的统一战线中，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严格保持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独立性。在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中，強調这个独立自主原則，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国民党頑固派从来不愿絲毫放棄其独裁統治，就是在抗日时期，頑固派也是要求一切統一于它，一切服从于它，不允許其他的阶级和党派有任何的独立性和民主权利。在统一战线中，国民党的态度是唯我独尊，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根本不容許有任何民主协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才能抵抗頑固派的独裁統治，冲破其控制、限制，把人民发动起来，把抗战推向胜利。当时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一切經過统一战线”的主張，实际上就是一切經過国民党，一切等待頑固派的点头，頑固派不点头，就什么事也不能干。这是一种把自己手脚捆起来、听凭宰割的投降主义。党和毛澤东同志严正地批判和克服了这种投降主义的錯誤思想，貫徹执行了独立自主的方針，才保证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在统一战线中，代表中間势力的民主党派，在頑固派面前更加沒有地位，更加沒有发言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統一，又独立的方針，同时代表了中間势力和民主党派的利益，引导他們向頑固派进行爭取民主权利和合法地位的斗争，帮助他們从斗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并且逐步地提高其政治的認識和信心。应该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沒有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針，沒有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各民主党派的成长和发展，是很困难的。

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針，最主要的是为了发展进步势力。在国民党統治区，党在这个方針之下，利用一切可能发展了进步势力，影响和爭取了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知識分子在內的广大群众。在敌后，党在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則下，冲破頑固派的限制，超越国民党限制的范围，不靠他們委任，不靠他們发餉，独立自主地发动和领导人民抗日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广泛地組織人民团体，认真地加强

①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84頁。

②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問題》。《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8頁。



党的建設。党的建設，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中国人民手里的这三个主要法宝，三件主要武器，在敌后抗日战争中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內，空前地发展和强大起来，以至能够停止日寇的战略进攻，担負起抗击日伪軍主力的任务。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們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目的，总的說来，就是毛澤东同志指出的：“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經取得的陣地。这是我們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這個陣地就一切无从說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陣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統一战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①正因为坚持了这个方针，我們才保持了党和工人階級的独立性；空前規模地发展了党和进步力量，很大程度上爭取了中間势力和民主党派，基本上孤立了頑固派，大大地发展了陣地。

由此可見，只有既統一，又独立，才能在工人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爭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孤立和战胜大資產階級。

第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又联合，又斗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解决矛盾，在新的基础之上，继续团结前进，这是我們党领导統一战綫、处理統一战綫內部关系的一般原則，一般政策。在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中，同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蔣介石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因为情况特殊，又有其特点。有些什么特殊情况呢？就是：蔣介石集团虽然被迫参加抗战，但只是消极抗战，并且阴谋妥协投降；虽然被迫承认統一战綫，但没有放棄独裁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并随时准备分裂。实际上，国民党軍隊的主力不是用在抗日，而是用来封锁和牵制八路軍、新四軍，一有机会就挑起反共战争，并暗中勾結日寇，借刀杀人，阴谋消灭八路軍和新四軍。这就是說，同蔣介石国民党的統一战綫，乃是一种带有很大对抗性的合作。其原因，在于蔣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我們对蔣介石集团的投降、分裂阴谋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必須針鋒相对地进行严正的斗争。只有針鋒相对的严正的斗争，才能迫使他們不敢公开投降，不敢公开破裂，而有利于合作抗战，才能抵制其反动政策，和縮小其反共反人民的范围，而有利于发展进步势力，爭取中間势力。針鋒相对，以斗争求团结，这就是同蔣介石頑固派又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的兩面政策。毛澤东同志对这个革命兩面政策作了明确的說明和指示，他說：

“对于反共頑固派是革命的兩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頑固派又有兩面性，我們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結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頑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兩面性，因此我們的政策也有兩面性，即在他們尚不願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們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軍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②

①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85頁。

② 《論政策》。《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61頁。



“有理，有利，有节”，是我們同頑固派作斗争的基本原則。有理，有利，有节，三者不可分离，不可缺一，但理是第一。在一切斗争中，理在我手，就能在政治上掌握主动权，取得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拥护，而使对方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地位，从根本上孤立起来。我們党是最先进、最能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和意志的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們提出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先进最完整的路綫和綱領，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和文化上，制定了切合当时情况的一般政策和具体政策，并且把这个路綫、綱領和这些政策，在敌后抗日战争和抗日根据地中付诸实施，給全国人民作出了光輝的榜样，同頑固派在政治上形成了鮮明的对照，道理完全在我們这边。这里所說的有理，是每一个具体斗争中要有理。有了理，还要有利，就是要在形势对我們有利，并有胜利把握的时候才斗。但斗，又不能一直斗下去，因为我們的方針是以斗争求团结，所以又要有节，适可而止，并且在斗争告一段落时，主动地同对方讲团结。把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則用来对付頑固派的軍事进攻，就成为“自卫原則，胜利原則，休战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于頑固派的軍事进攻，必須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但是不打无把握之仗，要适可而止。

在同頑固派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是一项重要的策略。国民党是一个成份复杂的政治集团，虽然頑固派占着統治地位，但不是全部。除了頑固派以外，还有許多中間派，也有一部分进步分子，这使我們有可能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在頑固分子里面，也是派系林立，利害不一，在不同时候和不同条件下，他們的态度和行动不尽一致。这使我們有可能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在每一次斗争中，不同时打击許多頑固派，而选择其中最反动的一部分，集中力量打击之。

在同頑固派斗争时，要注意争取中間派。我們同頑固派作斗争，是依靠进步力量，并且是为了保护进步力量的发展。但同时必須进行争取中間派的工作。中間派同頑固派有矛盾，因为他們經常地处于頑固派的压迫之下，我們同頑固派作斗争，同时也是保护了中間派的利益。我們同頑固派作斗争时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則，又能使中間派認識到道理在我們这一边，感到我們是仁至义尽，不能不同情我們。所以争取中間派是可能的。但中間派总是动摇的，并且包括着各种不同的力量，我們必須在每一次斗争之前、之中、之后，都注意向他們做說服教育工作，对他們的錯誤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批評，才能争取他們中有些人中立，有些人同情，有些人参加，而把他們中的右翼分子孤立起来。我們党就是这样不断地向中間派进行争取、教育工作的。

第三，坚持国共合作，同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准备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內战天共，这是蔣介石国民党的根本方針，被迫接受国共合作，只是它的权宜之計。他的內战天共的根本方針从来不变。这就是蔣介石“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党和毛澤东同志看准了蔣介石国民党的这个不变的根本方針，在抗日时期，在不遗余力地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而斗争的同时，总是指示全党全軍提高警惕，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日本



投降以后，在不遗余力地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的同时，又一再指示全党全军提高警惕，准备以自卫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也只有向着最坏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才能在突然事变到来的时候，不致陷于手足无措。无论在抗日时期，或是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一个时期，我们的军事政策是自卫的，又是坚定的，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并且对于敢来进犯的敌人，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正因为而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全党全军有了充分的准备，有了坚定的军事政策，所以在抗日时期，我们能够打退蒋介石国民党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发动的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制止其全面分裂的阴谋，把抗日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而在一九四六年，蒋介石集团敢于实行全面分裂，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以后，我们能够胜利地进行解放战争，最后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

四 区分主要同盟者和非主要同盟者，依靠工农联盟，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参加这个革命的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劳动人民为主体。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定。这个规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问题，也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主体和工人阶级的主要同盟军问题，从而也就明确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问题。

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的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谁能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问题，谁就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履行这个任务，只有工人阶级能够充当农民的领袖。“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他们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①。孙中山逝世以后，到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真正有可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076页。



能来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一到真正要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就感到恐惧了，并且终于背离工人、农民，附和了大资产阶级反革命。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最困难的环境中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现在的各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般是赞成减租减息的，而真正赞成耕者有其田的却只有少数人。（解放以后，他们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的制定，赞助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历史的记录正是这样：“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①

农民问题也是我们党内区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一个分水岭。历史上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左”倾机会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认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不懂得工农联盟是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右倾机会主义者把资产阶级看作主要的革命者和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例如陈独秀，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因此，他主要不是依靠同农民联盟，而是依靠同资产阶级联盟。抗日战争初期，第二次王明路线又重复了这种错误，他们认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而不是依靠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左”倾机会主义者则只重视工人运动，而轻视农民的革命毅力和农民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甚至害怕农民势力超过工人势力。他们不承认由农村革命根据地包围城市、到夺取城市的道路，而坚持城市中心论和由城市到农村的道路。这两种人既然都不能正确地解决农民问题，即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同盟军问题，他们也就无力正确地解决辅助同盟军问题。因此，他们也就都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只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指出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热情地歌颂农民运动“好得很”，并且提出了农民运动的正确路线。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土地革命运动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辟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又继续正确地解决了农民运动的一系列问题。这样，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就在中国造成了旋转乾坤、转换时代的工农联盟，就能够依托农民革命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组成雄偉的革命力量，夺取被反革命长期强固地占据着的城市。这样也就能够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有力地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对于农民运动可以有三种立场、三条路线：“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076页。



們呢？还是站在他們的对面反对他們呢？”^①毛澤东同志的路綫，就是站在农民运动的前面坚定地領導他們前进的路綫。这条路綫的根本点，一是坚定地相信农民群众是要革命到底的，他們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一切帝国主义、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将被他們葬入坟墓”^②；二是坚定地相信党和工人階級是能够領導农民群众前进的，“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败，沒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③。我們党贯彻执行了毛澤东同志的这条路綫，所以既能始終同农民群众站在一起，和他們同呼吸，共命运，又能給他們以工人階級的領導，幫助他們認識长远的利益和正确的方向，引导他們一步一步前进。

在这条路綫的指导下，我們党成功地領導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解决了农民問題，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經驗。这里，讓我們列举民主革命时期領導农民战争和建設农村根据地的几項主要的經驗：（1）武装农民，进行革命战争，建設革命軍队。（2）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发展革命根据地。（3）实行依靠貧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別地消灭封建剝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的总路綫和总政策。（4）实行坚决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組織力量，发动农民自己救自己、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保卫土地的群众路綫方針，反对把土地“恩賜”給农民的錯誤方針。（5）在土地制度改革之后，領導农民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根据自願和等价交换的原則，組織互助合作，以利发展生产，限制农民在經濟地位上的新的分化。（6）建設根据地，发展生产，发展經濟文化事业，支援革命战争。（7）建立工会。建立青年团。解放妇女和青少年。（8）建設共产党，保证党的核心領導作用。（9）实行团结城市小資产階級、爭取民族資产階級和其他爱国分子的統一战綫政策。我們的經驗证明，以上这些是解放农民的必由之路，也是教育农民，在政治上把农民，主要是貧农群众，逐步提高到接近工人階級水平的必由之路。

城市小資产階級，是人口仅次于农民的一个广大的人群。他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压迫，大多数有很大的革命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工人階級的可靠的同盟者。在城市斗争中，小資产階級群众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們中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鋒的和桥梁的作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一九四五年的一二一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可以說，工人階級和城市小資产階級的联盟，是城市斗争的基础。应当扩大和巩固这个基础，以爭取和联合民族資产階級以及其他的爱国分子，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

城市小資产階級又是一个过渡性的階級，包含着許多的阶层，构成了从工人階級到資产階級之間的整个阶梯，他們經常处在資产階級影响之下。他們不是革命的主力軍，不可能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更不可能有独立的出路。他們只有在工人階級领导下，并且只有同农民

^{①②} 《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14頁。

^③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06頁。



的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发挥重要的革命作用，并获得自身的解放。毛泽东同志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① 知识分子是这样，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也是这样。

我们党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团结他们，组织他们参加城市革命斗争，并输送力量参加农民战争。我们大量地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政府工作，加入我们的学校和其他文化工作，并将具备入党条件的人吸收入党，带领他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逐步地克服自己的弱点，同老党员老干部打成一片，融合起来，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融合起来。毛泽东同志说：“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② 我们党成功地执行了这个政策，培养了大批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久经锻炼的党和非党的干部，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项宝贵财产。

在我国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已经一再分析过）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地动摇于工人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不但丧失了革命领导者的资格，而且不再是民主革命的进步力量。“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③。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只能成为工人阶级的辅助同盟者。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又在政治上有相当影响，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有相当的重要性，而且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和足够的力量，他们的多数以至大多数就可以被争取到革命方面来，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又是工人阶级的重要的辅助同盟者，我们有必要和可能对他们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政策。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增加了革命的力量，有利于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而且有利于争取在民族资产阶级影响之下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所以，争取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争取领导权的一项重要任务。

争取开明绅士也是重要的。开明绅士，即从地主富农阶级分化出来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个别人士，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民族资产阶级大略相同。开明绅士在政治上没有民族资产阶级那么大的影响，在经济上和文化上没有民族资产阶级那样的作用。但是，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于实行减租减息，曾经给我们相当的帮助；在抗日战争后，又表示赞助土地制度的改革。这对于分化中小地主和中立富农，对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多数同土地有联系）和知识分子（他们多数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起了相当的作用。这些，又都是有利于我们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因此，我们对于开明绅士，也必须采取争取和团结的政策。毛

①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46页。

②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11页。

③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6页。



澤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經指出：

“爭取中間勢力是我們在抗日統一戰綫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須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們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們的利益；（3）我們对頑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間勢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頑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軍；因为頑固派也正在极力爭取中間派，以便使我們陷于孤立。在中国，这种中間勢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們同頑固派斗争时决定勝負的因素，因此，必須对他們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①

毛澤东同志在这里指出的爭取中間勢力的条件，也就是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的条件，因为民族資產階級是当时中間勢力的主要角色。我們在抗日时期，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凭着这些条件，爭取了这个階級的大多数。

毫无疑问，爭取民族資產階級是經過了反复的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的，但这又不同于同大資產階級的又联合又斗争。民族資產階級没有大資產階級那么多的反动性和对抗性，并且基本上没有掌握过政权和武装力量。因此，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基本上没有武装力量的联合和斗争，而主要是政治上的联合和斗争。斗争的主要手段是批評和教育，而批評也是为着教育和团结。这在前面已經反复論述过了。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关于在抗日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照顾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策問題，主要的有以下兩項：

（一）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經濟，公私兼顧，劳資两利”的經濟政策：一方面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他們发展生产、繁荣經濟的积极性，使他們有利可图；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国营經濟和合作社經濟，适当改善工人生活，不使私人資本壟断国民經濟和过分剝削劳动者。这对于私人資本，是又保护又节制其发展的政策，也就是在有利于国計民生的条件下，允許和保护私人資本的发展。这个經濟政策，是我們对整个民族資產階級，包括这个階級的右翼分子在內，所实行的政策。毛澤东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指出：“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少数右翼分子，他們也是革命的敌人”^②。“当着他們的反动傾向尚能影响群众时，我們应当向着接受他們影响的群众进行揭露的工作，打击他們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群众从他們的影響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經濟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我們就要犯錯誤。”^③为了达到爭取这个階級的多數、孤立其少数的目的，我們对这个階級的經濟地位“在原則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④。这个政策，一直实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經過国家資本主义基本上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止。

① 《目前抗日統一戰綫中的策略問題》。《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42—743頁。

② 《关于民族資產階級和开明紳士問題》。《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6頁。

③ 《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4頁。

④ 《关于民族資產階級和开明紳士問題》。《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7頁。



(二) 实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权。在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的条件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广泛地吸收民主人士，包括开明绅士，参加人民政权，并且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这种政权的人员分配曾经采取三三制，即大约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他们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占三分之一。这个政权，经过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民主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都是工人阶级在城市中的统一战线工作，都必须依靠工人运动。工人运动，任何时候，都是党的一项根本工作，离开了它，就不能争取其他阶级。工人运动，统一战线工作，构成整个的城市工作和城市斗争。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就走了由农村到城市的道路，总的说来，农村斗争处于主要地位，城市斗争是配合农村斗争的。“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棄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沒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棄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沒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沒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①。在农村工作和农村斗争成为中心的长时期中，党和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放松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并且在这方面的的工作中，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形成了一条正确的策略路线。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条件不同，特别是由于敌人集中力量控制大中城市和交通要点，城市斗争显然和农村斗争不同，不能采取农村斗争和农民战争的策略，而应当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②的方针。在这里，不是公开的红色组织，而是要善于结合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非法活动和合法活动。党的组织必须精干；必须极端秘密，善于荫蔽自己；而同时又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群众工作，并且打入各种群众团体，如黄色工会、学生会、教育团体、文艺团体、工商业团体、宗教团体等等，在这些团体中荫蔽自己，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群众。在这里，不可能像在农村根据地那样宣传和实行党的纲领的全部要求，而是要“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③。在这里，阶级关系十分复杂，资产阶级的影响很大，必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30页。

② 《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762页。

③ 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转引自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35页。



須把下层群众工作中上上层統一战綫工作适当地結合起来，尽可能爭取中上层人士对斗争的同情、贊助和参加，以便团結他們和在他們影响下的群众，孤立主要敌人。这些，就是我們党在城市工作中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策略路綫的几个要点。我們党的城市工作，曾經长期地被“左”傾机会主义所統治。“左”傾机会主义者的主要特点是冒險主义和关門主义，反对刘少奇同志代表的正确策略路綫。他們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后，繼續坚持中心城市起义論，拒絕必要的退却和防禦，拒絕利用公开合法的可能，不顾一切地发动群众甚至强迫群众进行冒險的斗争，并且一定要斗争到底，“决不妥协”。他們拒絕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对于别的派別反对敌人的斗争，只要綱領、口号和他們不完全一样，就不給以支持，甚至加以反对；对于在群众組織中有影响有威望的其他派別的人士，一定要驅逐出去，直到只剩下“清一色”的“布尔什維克”，或者把这些团体“轉变”成紅色团体为止。这种冒險主义和关門主义的策略，在第三次“左”傾路綫統治时期，曾經使我們在城市中的力量差不多损失了百分之百。一九三五年以后，在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糾正和克服了“左”傾机会主义路綫，在城市工作中采取和执行了刘少奇同志所代表的策略路綫，城市工作才又获得很大的成功。这样，就从正面和反面证明了这条策略路綫的完全正确。

五 区分領導者和同盟者，发展工人階級的独立政治力量， 把同盟者提高到当前革命綱領的水平

在統一战綫中，工人階級要影响和爭取别的階級、阶层，别的階級、阶层也要影响和动摇工人階級。毛澤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曾經这样尖銳地指出：“在統一战綫中，是无产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还是資產階級領導无产階級？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說：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張的抗日救国十大綱領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資產階級专政和片面抗战？”^①这个誰吸引誰、誰領導誰的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体的内容会不同，尖銳性的程度会不同，但这无疑是統一战綫中任何时候都存在的斗争。实现无产階級領導权的斗争，实际上，就是要在政治上把同盟者尽可能提高到当时革命斗争所要求的水平。工人階級在統一战綫中，不但决不可以被其他的階級、阶层所影响和动摇，以至把自己降低到同盟者的水平；而且相反，必須积极地影响和吸引其他階級、阶层，尽可能提高他們的政治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必須发展工人階級的独立政治力量，从根本上說，就是必須有一个成熟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

又区别，又联合；先区别，而后联合。为了在統一战綫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政治上逐步地把同盟者提高到接近自己当前政治主張的水平，工人階級和它的先鋒队必須首先同一

^①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82頁。



切同盟者划清阶级界限，——既要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也要同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而后在一定条件下同他们建立共同行动。这在政治上说，主要地就是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纲领和口号，而后在这种纲领、口号的一部、大部或者全部的基础上，同其他阶级或者派别找到共同点，建立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统一战线，同时在一切实点上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主张和行动，并且逐步地提高同盟者的水平。不这样，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就必然要在统一战线中犯投降主义或者尾巴主义的错误。

两个以上的阶级、两个以上的党派结成统一战线，一定要有共同的政治纲领作基础，才能有统一的行动。共同纲领，一般说来，总是反映当时历史条件下各阶级的力量对比和共同要求，而不可能反映各阶级的全部要求，各阶级还会保持他们自己的独立的要求。共同纲领表现统一，独立的要求表现矛盾，所以既有联合，又有斗争。就是对于共同纲领，各阶级各党派的态度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也就不可能不既有团结，又有斗争。所以革命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既必须有自己的独立纲领，这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纲领，又必须善于同别的阶级和党派达成共同的纲领，并经过共同纲领，又联合又斗争，逐步地把他们提高到自己最低纲领的水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的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经过了一个复杂的曲折的过程。

中国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孙中山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纲领，原来是反映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旧三民主义。一九二四年，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采取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更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这个政策和宣言，对外主张联合苏联和其他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在国内，主张联合共产党，唤起民众，扶助工农，建立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实行民族平等。这就是新三民主义。作为一般的政治纲领，新三民主义的这些主张，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的相应的主张基本上相同，因此成为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共同纲领。但是，对于这个纲领，在国民党内，实际上只有左派即革命民主派是坚决拥护的，除了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右派坚决反对以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多数的中间派是动摇的，要把他们提高到这个纲领的水平，还需要经过严重的斗争。当时，依靠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紧密合作，对右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曾经坚决地实行了这个纲领，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把革命推进到一个空前未有的高潮，这就是以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为标志的第一次大革命。这种形势，使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中间派则表现更大的动摇。同时，这种形势，又很有利于依靠和发展革命群众的力量，来稳定和争取中间派，彻底孤立和分化右派，贯彻实行新三民主义。很可惜，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放弃斗争，竟至形成完全相反的结果。



一九二七年以后，蔣介石国民党完全背叛了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們所实行的一切政策，基本上仍然是符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但是，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前，党内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放棄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特别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正在逐渐成为赞成抗日的各阶级、阶层和派别的共同要求，而“左”倾机会主义者仍然坚持自己的孤立政策，不善于在这些适合当时革命要求的口号上同其他派别达成共同纲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并进一步教育和提高同盟者。这样，他們就在实际上放棄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

遵义会议以后，党和毛澤东同志在理論上和政策上大大地发展和完备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毛澤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論》、《論联合政府》和《論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在理論上和政策上闡明新民主主义纲领的經典著作。另一方面，党和毛澤东同志又善于同别的阶级、派别达成共同纲领，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正式声明願以新三民主义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和共同纲领。党在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彻底实行了这个纲领，同时向反对和破坏这个纲领的国民党頑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此空前地壮大了进步势力，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間势力的左翼提高到新三民主义的水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也把他们の中間分子提高到接近这个水平，孤立了他們的右翼，更孤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頑固派。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革命高潮已經到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接近最后胜利，不仅新三民主义，而且全部新民主主义纲领就要完全实现。因此，我們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間势力的统一战线，已經不只是要把他們提高到新三民主义的水平，而是要进一步把他們提高到整个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水平。这当然更不能不经过尖锐的斗争。斗争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关于推翻蔣介石为首的整个反动统治，关于耕者有共田，特别是关于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这个斗争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我們在前而分析过的中間路线问题。整个斗争的結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間派别的多数，宣布拋棄中間路线即旧民主主义道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全国解放以后，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分子、城市民主改革、三反五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几大运动，进一步比較彻底地清算了在这些問題上的中間路线思想。

为什么說不仅要把民族资产阶级提高到新三民主义的水平，而且要逐步把他們提高到全部新民主主义的水平？因为我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不仅同新三民主义有基本相同之处，而且存在着根本性的原则区别，这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孙中山主張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誰来联合和扶助呢？孙中山主張实现“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政权，誰是这个政权的领导者呢？孙中山的意思显然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我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則明确规定由工人阶级領



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达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讲到人民民主专政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关系时，曾经这样指出：“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①

(二) 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工农联盟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

(三) 把革命进行到底，即革命的彻底性。这就是放手发动和武装平民，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用马克思所说的“平民手段”，彻底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和土地革命。这是不承认工人阶级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不承认农民为革命的主力、不承认工农联盟为统一战线的基础的三民主义者，一概做不到的。

(四) 准备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从对中国社会阶级的具体分析出发，提出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规划。这就是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分作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混淆两个阶段的不同任务。而两个革命阶段又必须互相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这样，我们的全部纲领就包括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和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两个部分，并且在新民主主义纲领中就包括着由民主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这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建立和巩固，工农群众的彻底发动和武装起来，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合作社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革命的彻底性等。在这个问题上，最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例如孙中山，也只是抱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以为只要实现了三民主义，就可以使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就不需要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

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这些区别，来源于不同的世界观。这是共产党同一切革命民主派在政治上发生原则区别的根本出发点。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和我们共产党人共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条件下，面临着共同的革命任务，在几个基本点上，达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又由于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而同我们发生原则的区别。

以上，我们论述了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的区别，又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之间的共同点和区别，同时也论述了我们党怎样一步一步地提高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的政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2页。



治水平。总的說来，我們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不但必須把民族資产階級从旧民主主义提高到新三民主义的水平，而且必須把他們逐步提高到工人階級最低綱領即新民主主义的水平。这个历史任务，我們經過二十八年的斗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基本上完成了。近十年来，又在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这个階級的人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便使他們在政治上能够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跟随工人階級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现在看来，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經過长期的努力也是能够逐渐完成的。由此可见，把民族資产階級的人們在政治上提高到工人階級的綱領的水平，这是，也只能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逐步发展以至曲折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是有同有異，有联合有斗争，在同样的方面合作，在異的方面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把他們提高一步。派別不同，同異的内容和程度不同，联合和斗争的内容和程度也就有所不同。这样又联合又斗争，把同盟者逐步地提高到自己的綱領的水平，就把原則性和灵活性、把工人階級的独立性和广泛的統一战綫結合和統一起来了。

工人階級同小資产階級划清界限，把他們逐步地提高到自己的水平，这在中国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不仅表现在統一战綫中，而且还表现在党内斗争中。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城乡小資产階級极为广大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有强大的小資产階級政党。中国工人階級政党——中国共产党成为真正代表全民族利益，特别是在全民族人口中占最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階級利益的唯一政党。因此，不仅广大的小資产階級群众能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并且有大批小資产階級革命民主分子到工人階級的队伍中来寻找出路。中国工人階級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資本主义三重压迫，沒有社会改良主义的經濟基础，并且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沒有社会民主党的傳統，所以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决性。但是工人階級人数較少，年龄較輕，多数是破产农民和其他劳苦群众出身，同农民和其他小資产階級群众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这种历史条件，在一方面，不仅便于工人階級同广大的小資产階級群众結成亲密的联盟，而且使中国共产党有必要和可能吸收大批的小資产階級出身的先进分子，把他們改造成为工人階級的战士，建成一个能够联系最广泛的劳苦大众的群众性的党。另一方面，这又使我們党不仅在党外处在小資产階級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也是小資产階級出身的党员占了多数，他們或多或少地带着小資产階級思想的尾巴。即使是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这种条件下，也容易沾染小資产階級的色彩。

我們党已經证明自己有能力改造和溶化小資产階級的先进分子，使他們成为工人階級的坚定战士。我們党的大批优秀的干部和党员，大都是从小資产階級分子改造过来的。但是，这种改造是不容易的，根据我們党的經驗，需要經過长期的实践和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同志的小資产階級思想必然要在党内反映出来，表现为右的或者“左”的錯誤。尤其在他們还没有达到无产阶级階級的階級觉悟，即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的时候，他們往往以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維克”，不仅不接受党的改造，而且要按照自己的面



貌来改造党。“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 and 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①。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右的或“左”的路綫錯誤，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篡党的表现。

我们党又长期地处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者同他们分裂的环境中。由于这种环境，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有时向右边发展，有时向“左”边发展。历史經驗表明，在我们党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在这种时期，由于联合，就容易有一些同志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原則界限，而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綱領、政策、思想、实践看成一样的东西；由于强调团结，就容易在不同程度上忽视斗争。特别是党内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在这种时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表现出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王明路綫，就是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接受自由资产阶级思想以至大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在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的历史时期，党内则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在这种时期，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容易激起同敌人拚命的急躁情绪；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容易激起忽视同盟者的情绪。特别是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反映着小生产者在经济上的不稳定性和孤立性，对于长期残酷的革命斗争缺乏顽强性和坚韧性，在这种时期容易表现为打倒一切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綫，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左”边的发展。

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同资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必须特别注意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防止党内右的偏向；而在同资产阶级分裂的时期，则必须特别注意同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划清界限，防止党内“左”的偏向。

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右的和“左”的錯誤路綫，从思想方法上說，来源于他们的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識而缺乏感性知識，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們前面所說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識，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們前面所說的經驗主义”^②。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經驗主义者往往成为教条主义者的俘虏，因为教条主义者能够背誦馬克思列宁主义詞句，借以諱众取寵，吓唬經驗主义者；同时教条主义者如果没有經驗主义者的合作，也不易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51—52頁。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問題的決議》，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52頁。



流毒全党，因为經驗主义者一般担任实际工作，他們接受了教条主义，就把它贯彻到实际中去。不論教条主义，或者經驗主义，都是主观主义，都違反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则。这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就是中国历史上右傾路綫和“左”傾路綫的思想根源。右傾机会主义者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下，抄襲西方资产阶級革命的旧套，用一座万里长城隔斷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把民主革命和統一战綫的领导权送給资产阶級，他們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完全丢掉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陈独秀主义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左”傾机会主义者往往抓住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語句当作教条，并且机械地、生硬地搬用外国无产阶級革命的某些經驗，而不顾中国的具体特点。他們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統一战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三次“左”傾路綫，就是这个方面的典型。

所以，在党内克服这一切主观主义思想，树立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思想，是建設共产党的最根本的問題，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只有这样，只有在党的骨干中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右的和“左”的錯誤，而有一个政治成熟的党。只有这样一个党，才能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級的领导权，保证中国革命到达胜利。

我們党走过长期曲折的道路，到一九三五年遵义會議，終于結束了錯誤路綫的統治，确立了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在全党的领导。在遵义會議以后的十年間，党在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又进一步在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中，逐步地从思想上和实践上克服主观主义，树立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方向和作風。毛澤东同志一方面引导党的干部在工作中实行調查研究、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并亲自作出了良好的范例；另一方面，引导干部学习党的历史，从党的正确和錯誤、成功和失败的丰富的历史經驗中吸取教訓，把历史經驗提高到理論的水平。毛澤东同志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实践論》、《矛盾論》、《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等著作，就是这方面的光輝范例。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毛澤东同志又发起和领导全党整風运动，对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集中地进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并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結同志”的方法，彻底地清算了历史上历次路綫錯誤及其思想根源，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害最大的第三次“左”傾路綫及其思想根源——教条主义。这样，从一九三五年起，經過十年的時間，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終于使全党在毛澤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团結。这是我們党的建設上一个重大的历史轉折点，是我們党成熟的标志。毛澤东同志在党内树立的調查研究、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则，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党的团結，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不但决定了尔后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而且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在今后，将继续保证我們党无往而不胜。



肯尼迪的裁軍童話和大炮預算

張 振 亞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美国統治集团的首脑人物散播了很多关于“緩和緊張局势”、爭取建造一个“实行裁軍的秩序井然的世界”之类的好話，以表示他們对和平的“向往”。不管他們做的是什么事情，这类好話是他們一有机会就要讲的。

“美国认为裁軍問題非常重要”，“必須不断努力以寻求一种切实可行和可靠的办法来削減軍备和限制軍备竞赛”。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一月七日在广播节目中作了这样的宣布。

“我們必須繼續不断地寻求和平——自由的人們能够获得安全的光荣的和平”。美国副总统約翰遜最近也在叫嚷。

“我們的最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每个国家不論大小都可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和平世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实现一种有保证的裁軍或裁減武器的制度。”肯尼迪政府的国防部长麦克納馬拉一月十九日在参議院軍事委员会會議上也这样說。

至于肯尼迪本人，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讲得更为聳人听闻。他說什么“只有在全

世界放下这些似乎为目前提供了安全但是却使我們将来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武器的时候，世界秩序才会得到保证”。他还假仁假义地叹息道：“这个地球上的广大資源正在越来越多地用于毁灭人类生活而不是用来丰富人类生活的手段。”

肯尼迪和他的閣員們在編造什么他們願意“裁軍”、“和平”和“放下武器”的虛話方面，的确有着出色的本領。他們显然想把全世界二十几亿人都当作幼儿园里天真的儿童来加以欺騙，以为只要天花乱墜地胡吹一通，就可以使他們乖乖地落入自己的圈套。

可是，謊言終归是謊言，戴着“热爱和平”的假面具的肯尼迪之流，不但不能用行动哪怕是暂时地支持一下他們的漂亮謊話，而且这出西洋景，很快就为他們迫不及待的各战行动戳穿了。

反映肯尼迪未来政策的实质的一九六三财政年度“預算咨文”出籠了。同肯尼迪的“和平”謊言相反，这个預算竟有五分之四的开支被用于軍事或同軍事有关的项目。其中所謂“国防开支”的直接軍費，据估計就是五百二十七亿美元，比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的一



九六一财政年度的龐大軍費又增加了五十二亿美元。这个預算不仅費用更大，火药气味更濃，而且它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对战略核武器和常规軍备双管齐下，都給予大量撥款：以九十四亿美元发展远程轰炸机、洲际彈道導彈、“北极星”導彈潛艇等战略武器，以一百八十四亿美元加強既能打大战又能打有限战争的常规部队，以十三亿美元提高海运和空运能力，以五十七亿美元用来研究和發展某些特定武器……。

“战争預算”，这就是新預算一露面便取得的头衔。連《紐約时报》也不得不說，这是一个大炮預算。

当然，在这个加緊备战的預算中，任何“裁軍”的鬼話都被吹得无影无踪了。但是，事情到此并未結束。原来这份預算，还只是肯尼迪政府在它拟訂的“五年防御計劃”中迈出的第一步，未来的扩軍备战的規模比这还要大得多。据麦克納馬拉透露：一九六六财政年度美国的“国防开支”，估計将从目前的五百多亿美元增加到六百七十亿美元。

肯尼迪的新預算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倒不用人們去費心猜想。据美新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狄龙一月二十一日在美国全国无綫电——电视节目中，已就新預算所反映的“开支哲学”的变化作了介紹：“現政府不仅強調全面核战争的問題，而且更加多得多地強調打有限战争的能力。”

肯尼迪在战争問題上要使美国成为多面手：既要打全面核战争，又要打所謂有限

战争和次有限战争。用肯尼迪的軍事顧問泰勒的話來說，就是“美国必須准备对付一切形式的战争，不論是以原子武器，以常规武器，还是以游击战术进行的战争。”这位所謂有限战争的“专家”还透露了做出这个决定的經過。他說：“只是在去年，我們最后才开始重新制訂我們的战略，以便符合国际生活的冷酷的事实。在那个时候里，我們采取了重大步驟，来改善我們的常规战争的能力”。

什么是泰勒所謂的“国际生活的冷酷的事实”呢？美国为什么有必要准备打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而且要“更加多得多地強調打有限战争的能力”呢？請听一下麦克納馬拉最近在美国参議院軍事委员会为新的軍事預算作证时談到的美国“軍事需要”吧！

这位前福特汽車公司總經理列举了“柏林危机”和“为南越的前途进行武装斗争”的种种“需要”之后，就念念有詞道：“老撾的主权仍在未定之天。共产党人一直設法在剛果获得立足点。他們已經控制了离我們自己的海岸只有九十英里的古巴。”他还叫嚷：“世界其他地区的极其不稳定的局势可以为共产党人提供其他的机会来扩大斗争地区。在非洲新兴国家、东南亚比較新的主权国家和那些現在和将来將經歷巨大的社会改革时期的南美和中美国家中，这个問題特別尖銳。”

在“反共”的幌子下鎮压民族解放运动，已經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老手法了。这位国



防部长口中讲的虽然是“防共”，但是，骨子里是在耽心遍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怒火会越烧越大。显然，肯尼迪强调打有限战争的动机正是在这里。

发展核战略武器准备打世界大战，用常规武器和所谓“反游击战”来镇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人民革命风暴，这就是肯尼迪的全球战略部署。肯尼迪准备的常规武器，当然不会仅是为了用来镇压民族解放斗争，他还企图用它来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挑

衅，同样也能用它来对付老牌殖民国家。美国打着联合国旗号，用武力在刚果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且同那些老殖民主义者不断厮杀，不就是一个实例吗？

希特勒分子曾叫嚷“大炮代替牛油”，狡猾的丘吉尔则宣称“武装起来进行谈判”，形式不同，好战的实质则一。而肯尼迪一面喧嚷全面裁军，一面大规模地全面备战，他的凶狠和狡诈，比起他的这些“前辈”来，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美帝国主义会放下武器吗？它会全面裁军吗？这当然是童话。对此，肯尼迪的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早在一九五七年《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就说得很明白：“如果事实上诉诸武力不可能，外交也可能失去效力。”麦克纳马拉最近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也说：“我们切不可迟疑不拿起武器来捍卫自由和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

肯尼迪政府执行对外侵略政策，是由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不执行这种外交，帝国主义就不能生存；而没有武器，这种外交就寸步难行。帝国主义不要武器是无法想像的。

因此，肯尼迪的裁军童话不可信也不能信，这才是“国际生活的冷酷的事实”。



平 衡 方 成



美国式的“自由”

陈 原

一、誰的“自由”

肯尼迪在今年的“国情咨文”里，一連用了二十几次“自由”的字眼。这个踐踏自由的政治騙子，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如他自己所吹播的“自由的偉大捍卫者”。他不知羞耻地大談其“自由的經濟”、“自由的制度”和“自由的社会”等美国式神話，并且推而广之，要人們通过所謂“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什么“自由的国际大家庭”。真是好听得， “自由的气氛”一时似乎瀰漫整个华尔街了。

就是肯尼迪大肆吹嘘“自由”的时刻，在美国每分钟所发生的事件，却給这位总统所贩卖的“自由”究竟是什么货色作了注脚。最近，美国联邦法院正忙于准备“审讯”美国共产党员，而国务卿腊斯克更加急躁，他宣布立即吊銷美国共产党人的出国护照。肯尼迪的“先驅者”希特勒，在三十年代演出过名为“审讯共产党员”实即加紧法西斯化的丑剧，而今肯尼迪公然走上这条老路。如果說三十年代的美利坚，曾因共产党合法存在而标榜过“民主”“自由”，那么，现在連那一点点裝門面的“自由”，也給取消了，現

在只剩下挂在肯尼迪嘴边作为釣餌的所謂“自由”了。

从字典里檢出动听的字眼来裝飾自己、欺騙別人，那是政治騙子擅长的慣技。反正动听的字眼多得很，它們在肯尼迪之流的心目中，本来不值几文錢；但是将这些动听的名詞变成现实——而不是騙局，那就决非政治騙子們所願意或所能做的了。例如，肯尼迪在这次“国情咨文”里，又一次吹嘘“自由的制度”下的“自由”权利，說什么美国的公民都有“不受任何障碍越过州界旅行的权利”——仿佛这是“自由”得无以复加，簡直是身在天国了。可是神經正常的成年人驟然一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美国公民从这个州跑到另一个州，恰如一个屋子的主人(假如他是真正的主人)从这个房間跑到那个房間，难道这也值得自我吹嘘地說：瞧，我是多么自由呀！这岂不要叫人笑破肚皮。可是事情还不止此：甚至肯尼迪所吹嘘的“不受任何障碍越过州界旅行的权利”那种“自由”，究其实也不过是写在紙上的东西，对于一般人永远是不会兌現的。不管話說得



多么漂亮，事实终究是事实。举个例子说，去年五月和十一月里，美国一群黑白青年组成的“自由乘客”，就为着“不受任何障碍”通过州界旅行（当然也包括通过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州界），在蒙哥马利城和麦克康城遭到法西斯暴徒的“自由”殴打，伤亡累累。人们不禁要追问：写在纸面上的“自由”，究竟是誰的自由？肯尼迪们、洛克菲勒们、胡佛们乘着汽车去作竞选旅行时，或去镇压罢工时，或去海滨避暑时，他们倒确是有“不受任何障碍”地通过州界的自由。他们有自由。普通的百姓呢，即使标明是“自由乘客”，也并没有自由。举一反三，由此可见美国式的“自由”的秘密。

秘密就在于：在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私

有制统治下的美国，自由总是跟财产并列的。你有多大财产，你就能有多大自由。对于美国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他们除了有受压迫、剥削和失业、穷困的“自由”外，又能获得什么自由呢？肯尼迪之流奢谈“自由”，完全是愚弄人民的鬼话。事实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人民最容易得到的，只能是《纽约时报杂志》有一期报道过的这一类自由：——纽约一个母亲将两个儿女留在百货公司，留下了一张字条：“我十分爱他们，但是我沒有钱，沒有吃的，也无路可走。请大家可怜可怜他们吧。”写到这里，不免想起列宁的名言：“任何自由，如果它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①

二、所謂“最巩固”的“自由社会”

肯尼迪还在“国情咨文”里吹嘘美国这个“自由的社会”将成为“人类所締造的”“最巩固的组织形式”。但是，正如谚语所说：“纸包不住火”。前不久，美国特务头子胡佛在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谈话时，对这种所謂“最巩固”的“自由社会”作了露骨的自供。他说，按一九六〇年统计，在那么“文明”并且那么“自由”的美国，“平均每五十八分钟就发生一桩杀人案；每三十九秒钟就会有一桩夜盗案；每隔六分钟出现一次搶劫案；每分钟都会有一回大盗窃案；隔三十四分钟就发生一件强奸案；每四分钟出现一次凶杀案；而盗案案則每两分钟有一次。”胡佛还一再说明，很多案件都是青年入

干的。

美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当然不能过分相信。但是哪怕是缩小了很多的上列数目，也可以让读者从中看出所謂“自由的社会”里“最巩固的组织形式”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原来只不过是盗窃、搶劫、谋杀、强奸……。

人们说，这都是社会渣滓干的。不错，但是在资本惨重剥削下和在黄色文化“教养”下的“自由”美国，正是社会渣滓产生的沃土。受害的是誰呢？不是洛克菲勒们——他们出入有避弹汽车，有私家偵探，屋子内外装了铁门和警铃电网，而他们的财产大批变成资

①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6页。



本，正向国内或国外进行着剥削；也不是肯尼迪们——他们是垄断资本的忠实走狗，凡是资本家有的保卫武器，他们全有。受害的是手无寸铁、而且只有仅剩的生活必需品和廉价生命的普通美国人民。提起生命，在胡佛们的眼中本来是不值钱的，因此统计里没有这一项。胡佛只说，美国男女老幼——从婴儿一直到老太婆在内——每年因为偷窃、抢劫等等而损失的，平均每人要付出一百二十八元。以四口之家来计算，每户每年得为此损失五百一十二元——这对于一个年薪收入不满二千五百元的劳动人民来说，就意味着每个家庭每年得因此被夺去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收入！按



为 鑿 者 鈞 米 谷

照胡佛的说法，这些损失是公民们对于自己的安全“漠不关心”所造成的，这与“最巩固”的“自由社会”没有关系。

美国人民由于被偷窃、抢劫等等而受到的损失固然不小，但使他们受害最大的还不是这些，而是被垄断资本所“自由”吞噬去了的难以计算的剩余价值。我们在这里利用胡佛的材料，将这“自由”的社会加以揭穿，只不过是因为肯尼迪厚颜无耻地提到“最巩固的组织形式”罢了。问题还不仅限于在美国国内。在发表胡佛谈话的同一期《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还刊载了一则加拿大消息，据说大批美国罪犯涌向美加边境，在那里缔造“最巩固的组织形式”，大肆抢劫、贩毒、

卖淫、强奸和伪造文件……。这些罪犯一方面在麻醉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一方面又夺取他们被资本剥削所剩下来的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财产”和不值钱的生命。这样的现象已引起了加拿大公众的忧虑——其实这何止加拿大一国呢？美元所到之处，例如日本、西德，都在“缔造”着肯尼迪所谓的“自由的社会”。上举那条消息的标题说：“犯罪成为美国的输出品”。不错，对得很。但是在肯尼迪所谓“对自由(!)有所帮助”的输出中，区区几个罪犯，只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一点点小意思。打着“自由的国际大家庭”的旗帜，进行压榨、剥夺和吞并，这才是肯尼迪们最大的输出品。



“神圣”的祈祷和肯尼迪的谎言

岑 桑

据说，当美国国会举行会议时，国会议事堂的圆顶下，便会出现御用牧师的祈祷的声音。

“不要让我们落入迷途，你哀怜我们，你用自己奇妙的智慧教我们去反对自私自利，并在对一切人自由和公正的基础上支持我们的共和国。”牧师总是如此这般地开始他为会议而向上帝做的祈祷。

御用牧师每背诵一次诸如此类的经文，自由神的脖子上就多加上了一条绞索。一九四〇年，上帝“哀怜”了议长大人和议员先生们，于是“史密斯法”立了案；一九五〇年，上帝又以他“奇妙的智慧”使“麦卡伦法”顺利通过。……今天，也许又是“万能的主”慈悲为怀的缘故吧？他“在对一切人自由和公正的基础上”，再一次“支持”了白宫那些刽子手们履行自己的职责——向美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开刀。

在那整个空气都为压榨和欺瞒所窒息的美式“自由社会”里，在国会会议前如此装模作样地作一次祈祷，其目的只不过是用了上帝的名义来掩饰那些垄断寡头们残害人民的罪恶行径罢了。

用连篇的华丽词藻和诳人的鬼话打扮自己，肯尼迪可算是个能手。这个美国百万富

翁的忠实奴僕、扼杀美国人民民主自由权利的刽子手，在两三年前，为了要捞取政治资本为他爬进白宫做准备，曾经喋喋不休地大谈什么“公民自由”，甚至煞有介事地激烈抨击过艾森豪威尔政府，指责它“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不能保障人民的权利；认为那是像凶猛的恐龙一样“愚笨”，呼吁人们“不妨想想它（恐龙）的下场”。肯尼迪引用美国“建国祖先”的话慷慨陈词：“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认为造物者赐予他们以某些不可或缺的权利，其中包括维护生命、维护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他还说什么“自由是为安全服务的”，“自由与安全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矛盾；这是我们对于美国传统所抱的坚持不懈的信念”。好一个美国人民自由权利的维护者！肯尼迪说尽这些美妙动听的话，无非是想使人相信，他可以充当美国“自从林肯任总统以来最有能力的领袖”，如果让他当上总统，将会给予美国人民充分的自由。

然而，这一切都只像国会会议前牧师所做的祈祷一样，完全是一些骗人的鬼话。你看，当这位肯尼迪当上了总统以后，他所做的并不是什么维护“公民自由”的事业，而是拼命扩军备战，进行着妄图奴役全世界的“本世



纪的最大的冒险事业”。美国人民不但没有获得什么新的“不可或缺的权利”，相反，他们却被要求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冒险计划作出“更大的牺牲”。肯尼迪政府在反共的招牌下，更大规模地剥夺美国人民本来已经被剥夺得支离破碎的权利，这个政府比曾被肯尼迪激烈抨击过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还要残暴地蹂躏着美国的公民自由。

“神圣”的祈祷已经做过，肯尼迪此刻正在为所谓“美国安全”而声色俱厉地振臂高呼。从他的语调听来，“自由”与“安全”之间，显然已决不是“没有真正的矛盾”了，他公开把所谓“对于美国传统所抱的坚持不懈的信念”打下了十八层地狱。他在维护国家

“安全”的借口下，正在把美国的“公民自由”一笔勾销掉。但是，事情也很清楚，肯尼迪之流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往前走，他们的凶残的本质也就在美国人民面前越加暴露出来了。肯尼迪虽然冒充着维护“公民自由”的样子，抨击过他的前任不能保障人民的权利，可是他却干着比他的前任更多更坏的坏事。从前他说什么“不妨想想恐龙的下场”，而今他却只能继续走着恐龙的老路。历史对于美国统治集团就是这样决定着的。亿万美国人民决不能永远任凭少数垄断寡头们压迫和奴役，他们在美国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中，终将会得到教训，学会更好地进行斗争的本领，争取他们应该享受的一切权利。



临刑前

毕克官

——神父：懊悔吧！我的孩子。



增产更多更好的日用轻工业品

· 孔祥楨 ·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輕工业占有重要的地位。毛澤东同志曾經把重工业、輕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問題，看作是我国工业化的道路問題。他說：“我国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須肯定。但是同时必須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輕工业。”^①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決議也指出：“……必須根据原料、資金的可能和市場的需要，积极发展輕工业。采取这个政策，才能够有更多的消費品来供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繼續保持物价的稳定；才能够有更多的日用工业品去交换农产品，在經濟上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够更快地积累資金，来帮助重工业的发展。”^② 实践证

明，这些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广大人民对輕工业品的需要量很大。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需要

量将日益增加。解放以来，輕工业产品的生产，已經有了很大的增长，目前，由輕工业（包括手工业）所提供的社会零售商品数量，約占整个零售商品总额的一半。輕工业在滿足城乡人民日常生活需要中，起着重要作用。

輕工业对扩大城乡物资交流，从經濟上加强工农联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現阶段，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資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由于工业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农业主要是集体所有制，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經濟联系，必然要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进行。城市和工矿区居民，吃的基本上来自农村，穿的和用的很多也是以农产品作为原料制造的，这就要求农村供应粮食、副食品和工业原料。而农村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也要求城市供应更多的工业品。因此，多生产一些輕工业品供应农村，就有可能从农村换得更多的农产品，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发展輕工业可以为国家建設积累更多的資金。毛澤东同志指出：“……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輕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滿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頁。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1頁。

③ 《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4頁。



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③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国家的积累基金和财政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轻工业提供的。

重工业的发展，也必须以轻工业的发展为条件。重工业不仅依靠轻工业提供一部分资金和日用消费品，而且依靠轻工业提供一部分生产资料。轻工业发展了，可以从多方面促进重工业的发展。

当然，轻工业的发展决不能离开农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物质生产部门，它们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轻工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农业，同时，也必须依靠重工业。只有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才能够保证轻工业更好的发展。

二

轻工业部门同其他工业部门一样，在一九六一年认真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取得了初步成效。轻工业的各项产品，除了受农业歉收影响的以外，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经过广大职工群众的努力，许多轻工业产品不仅数量有了增加，而且质量有所提高，品种有所增加。一九六二年，轻工业部门的中心任务是：继续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增加生产；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加新品种；厉行节约，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计划任务。

完成这些任务，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我国由于农业遭受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暂时困难，正在逐步地

克服着。由于坚决执行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整个工业战线上的形势必将越来越好。在几年大跃进中，轻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由于加强了党的领导，企业广大职工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也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尽管当前还存在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是局部的、暂时的，是前进中的困难，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政策，鼓足干劲，艰苦奋斗，就一定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继续前进。

要完成一九六二年新的生产任务，从物质技术条件来说，关键在于组织轻工业的原料、材料的生产和供应。轻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材料，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与日俱增的。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来自农业的原料，同时，也要积极开辟新的原料来源。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经验来看，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发展和充分利用来自农业的原料。在轻工业原料中，农产品占相当大的比重。除纺织工业以外，轻工业部所主管的六十三种主要产品，有十八种是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这些产品的产值占六十三种产品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为了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要正确安排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比例关系，保证经济作物所必要的播种面积，并且切实贯彻各项有关政策。这是当前解决轻工业原料问题的主要途径。种植一定比例的经济作物，不仅对国家有利，而且也有利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 and 社员个人收入的增加。同时，



只有农村为轻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城市才能供应农村更多的轻工业品。

为了取得更多更好的来自农业的工业原料和固定原料的供应关系，有的地区建立了原料生产基地。原料生产基地最大的好处是，产品的商品率高，同加工工业的发展相适应。食品行业有些企业所建立的原料生产基地，对于解决它们的原料来源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北京葡萄酒厂，在一九五六年建立原料生产基地以前，葡萄的收购量只有二十多万斤；建立原料生产基地以后，一九六一年就收到了三百五十多万斤，葡萄酒的产量也从一九五七年的四万多斤增加到一九六一年的一千多万斤。

轻工业原料生产基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轻工业部门自办农场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从目前情况来看，这种农场一般的是侧重于生产小配料、辅助材料和培育良种，带有试验的性质，还不可能大面积地种植经济作物。

其次，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扩大使用来自工业方面的原料。目前，在轻工业原料中，农产品占很大比重，但是，仅靠来自农业的原料，还不能满足轻工业发展的需要。轻工业必须扩大新的原料来源，更多地采用来自工业的原料。来自工业的原料的生产，一般说来受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大，生产比较稳定。特别是用合成方法制成的原料，对于保证轻工业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扩大品种，有更大的作用。同时，轻工业更多地使用来自工业的原料，是合乎节约原则的。例如，一千万斤合成脂肪酸，可以代替生产三千万条

肥皂所需的油料，即抵六、七十万亩土地生产的油料。每一立方米木材所制成的人造纤维，抵六、七亩土地所生产的棉花。每生产二千斤从石油废气中提炼出的合成酒精，可以代替六千斤粮食。

轻工业生产采用来自工业的原料，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但是，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而且，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轻工业一个部门的事情，还必须以重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化学、冶金、石油等工业的发展为前提。因此，把轻工业所需要的来自工业的原料的生产，分别纳入有关部门的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充分发掘轻工业的内部潜力，最节约最合理地使用现有的原料、材料。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某些原料、材料还不能充分满足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原料、材料在使用上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浪费。拿同一产品的原料、材料消耗定额来说，不同企业有很大差别。例如，每制造十万支铅笔的椴木木材消耗定额，有的铅笔工厂是三点四立方米，有的是四点四立方米，相差近百分之三十。如果消耗定额都达到先进企业的水平，一年内就可以为国家节约几千立方米木材，增产上亿支铅笔。原料、材料消耗定额的高低，同技术装备和原料、材料的好坏有一定关系，但是，如果企业管理工作做得好，节约原料、材料仍然是有很大潜力的。有些工厂由于加强了对职工的思想教育，进行技术革新，改进企业管理，在相同的条件下，他们就节约了更多的原料、材料。



三

努力提高輕工业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是輕工业部門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产品质量的高低和品种的多少，是国家工业技术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志，也是决定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条件。对輕工业生产部門来说，则是考察企业为广大消费者服务得好坏的一个重要尺度。

一九六一年下半年，輕工业产品的质量比上半年有了提高。在日用工业品中，縫紉机、自行車、钟表和搪瓷制品等的质量，提高得比較显著。例如，上海对一百一十一种产品进行檢查的结果，上半年质量合格、用户满意的有九十五种，即占百分之八十五；下半年上升到一百零六种，占百分之九十五。但是，有些产品的质量仍然不好或不稳定，这是需要认真解决的問題。

在輕工业生产中，必須正确处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有的同志认为，要完成产品的数量任务，就不能保证产品的质量。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我們认为，在积极完成产品数量任务的同时，必須保证产品达到規定的质量标准。如果不重視质量，产品达不到規定的质量要求，降低了使用效果，即使完成了甚至超額完成了数量任务，也不能算真正地完成任务。比如，一双胶鞋可以穿六个月，如果只穿三个月就坏了，那末这双胶鞋就不是原来意义的“一双”胶鞋了。有些产品要求质量更严，离开了規定的质量标准，就沒有数量可言。例如，钟表的走时誤差超过了規定的标准，就沒有使

用价值，食品的生产不合卫生条件，只有报廢。

质量不好的产品，如果是消费者使用，就会使他們蒙受經濟上的損失；如果是企业和机关使用，就会影响这些单位的生产和工作；如果在本企业内部返修或报廢，就会影响企业生产計划的完成，造成原料、材料和劳动力的浪费。因此，产品质量的好坏是一个涉及到全局的問題，是一个同社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有着密切联系的問題。重視产品质量，是对国家建設和人民生活負責的表現。刘少奇同志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現在我們的經濟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须表現在它的质量上面。”^① 保证和不断提高輕工业产品的质量，是企业 and 每个职工的重大任务。

有些同志认为，輕工业产品质量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原料、材料的质量不稳定造成的。我們认为，原料、材料的好坏，固然会影响产品的质量，但是，决不能过分強調客观条件，放松主观努力。許多企业的經驗证明，只要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教育，提高工人的技术水平，进行技术革新，改进企业管理，健全責任制度，即使客观条件差一些，也是可以保证和提高輕工业产品的质量。例如，有些火柴厂使用同样的质地較硬、紋理歪斜、易于折断、含脂較多的松杂木作为原料，但是，由于他們采取了技术措施，对木材进行蒸煮脫脂和軟化的預处理，并且严格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頁。



执行操作规程和检验制度，因而就保证了火柴的质量。

在增加产品数量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还要增加产品的花色品种。社会需要是各种各样的，产品也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当国家建设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时候，要求产品品种更加丰富多采。

近年来，轻工业产品的花色品种是不断增加的。例如，各地生产了许多塑料制品、合成洗涤剂、新型号的钟表、自行车和各种型号的缝纫机，等等。仅上海一地，一九六一年投入生产的新产品就达三百多种，增加了三千多种新花色，并且注意了大、中、小号各种规格产品的生产。一九六二年国家在产品的品种规格方面，对轻工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轻工业部门的职工还要作更大的努力，保证完成国家的品种计划。国家的品种计划，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和生产的可能，全面地统一地安排的。如果有些企业不按国家的品种计划进行生产，就会打乱国家计划，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强调完成国家的品种计划，并不排除各地尽力生产自己需要而又可能生产的产品，特别是某些传统的名牌产品。这些传统的名牌产品的共同特点是，质量好而稳定，为广大消费者所喜爱。例如，食品工业中具有独特风味、驰名海内外的各地名酒；清洁卫生、易于溶解、为广大母亲们所称道的“红星牌”奶粉。又如家庭用品中享有盛誉的“固本”肥皂、“五洲”药皂、“白玉”牙膏，等等。在轻工业生产园地里，有着成千上万质量优良、

风格独特的地方传统名牌产品，只要我们作出必要的安排，这些产品的生产，完全有可能很快地发展，更好地供应市场需要。

轻工业部门还要注意产品的使用说明、包装和装潢。在使用说明书上把产品的配方、性能、使用和保管方法以及出厂批号等，加以介绍，既便利消费者使用，又能够吸收广大消费者监督产品的质量，在某些方面还有普及科学知识的作用。产品的包装，对产品起保护作用。目前，有些产品在出厂后由于包装不善，在运输过程中破损率很大，造成很大浪费，这是必须切实改进的。产品的装潢，可以给予消费者一种美的感受，好的装潢设计，还能够表现我国民族的风格。

增产产品修理所必需的零件，也是轻工业部门的一个任务。轻工业产品中许多是耐用消费品，例如，钟表、自行车、缝纫机和自来水笔等等。这些消费品经过长期使用，一部分零件就会磨损。因此，生产一定数量的零件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对消费者有利，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有利。为了增加零件的产量，经济领导部门应该尽量保证必需的原料、材料的供应；企业要努力改进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某些零件的收购价格过低，要经过生产部门和收购部门协商，求得合理的解决。

总之，摆在轻工业部门管理机关和广大职工面前的任务是很繁重的。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鼓足干劲，埋头苦干，千方百计，采取切实措施，争取生产更多更好的日用轻工业品，充分发挥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新 与 旧

公 盾

新与旧的问题是人們经常会遇到的。“除旧布新”、“送旧迎新”，这是人們熟悉的老話头。一部人类历史，充满着新与旧的斗争。没有新与旧的斗争，人类社会就变成一潭死水，不会有进步。

就社会生活的领域来说，真正的新事物代表着不断成长、壮大、前进的进步力量，是符合于历史发展方向的。它們像新生的婴儿，初升的紅日，具有无比旺盛的生命力，是不可战胜的。而旧事物則与此相反，它們代表着开始衰亡或正在衰亡的东西，必然要被新事物所代替。

在新与旧斗争的过程中，新的东西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上升为支配的力量；旧的东西由大变小，由强变弱，以至灭亡。这是基本趋势。当然，历史发展的行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切新的社会力量，从它初生开始，总是要经历許多曲折，克服許多困难，才能一步步发展起来。一切社会腐朽势力，即使到了最后的死亡阶段，也不会自甘灭亡，而总是千方百计地作垂死挣扎。可是，从长远来看，古往今来，新陈代谢，后来居上，是誰也抗拒不了的历史发展规律。

在新与旧的斗争中，馬克思列宁主义者

总是站在新事物方面，坚决支持新事物，促进新事物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认真研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

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因素，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从而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学会辨識新事物的嫩芽，加以爱护和扶植，并尽力帮助它們成长；同时还必须学会把真正的新事物同那种冒充“新事物”的旧事物区别开来。

在社会生活中，新与旧的斗争和它們的表现形式，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当然不能认为，凡是自称为“新”的东西，就是真正的新事物。旧事物往往采用某种新形式，或者打出“新”旗号，冒充新事物出现。

在思想领域内，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者将旧的、反动的东西，打出“新的”、“先进的”旗号来騙人，这是常常见到的事情。例如，被列宁严厉批判过的馬赫主义者，曾經采用各种新名詞、新术语，作为自己販运资产阶级旧貨的假面具。他們冒充“最新的自然科学哲学”，妄图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新成就，来证明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錯誤的。而实际上，正如列宁所指出，他們是在歪曲地利用科学上的新材料，販运早已被



科学推翻了的貝克莱、休谟、菲希特等人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論的旧貨，跟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毫不相干。

反动沒落的资产阶级甚至用“新”字牌号，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学术思想中某些带有进步倾向的东西统统拋棄，而将其中落后的反动的东西，发展成为更落后、更反动的东西。例如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康德的哲学，本来是唯物論同唯心論的調和，是二者的相互妥协；而被反动资产阶级教授学者加上了“新”字号的“新康德主义”，却完全地拋棄了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把康德哲学中最恶劣最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硬拼凑成为一个体系，百般宣揚。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的体系，具有保守性和反动性，而包含在其中的辯证法，是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可是被反动资产阶级教授学者加上“新”字号的“新黑格尔主义”，却完全擯棄了其中一切优秀的东西，大大宣揚和进一步发挥了黑格尔哲学中反动落后的东西。这种“新黑格尔主义”成为维护帝国主义反动統治，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辯护的学說，以至于給法西斯匪徒奴役人民和种族虐杀提供“理論”根据。

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反动派也常常把它们的变本加厉的殘暴統治，說成是什么“新”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希特勒匪徒曾把他們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說成是建立什么“新秩序”；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曾把他們对我国的侵略暴行，美其名为“建立东亚新秩序”；蔣介石匪帮在統治中国的期

間，为了推行其愚民政策，大事宣揚封建的旧道德、旧思想，然而他們却把这些标榜为“新生活运动”。所有这些“新”招牌，都不能掩盖他們最殘酷的反动統治，最野蠻最血腥的民族压迫和掠夺的罪行。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嘲笑过那些企图用假面具掩盖封建主利益，喊着“社会主义”口号的封建貴族，說他們屁股上还盖有旧的封建印章。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反动派不管怎样标“新”，他們屁股上的旧印章也是有目共睹，永远擦不掉的。

资产阶级愈腐朽沒落，就愈在各方面玩弄“新”花样。现在，在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艺术中，各种騙人的“新”花样，真是层出不穷。如美国的一些“新”画家；在身体上蘸顏料，在画布上打滾作画，甚至驢子的尾巴、猩猩的巨掌胡乱塗出来的东西，也当作了了不起的美术創作；在倫敦，举行过用眼睛瞧而不用耳朵听的所謂沒有声音的音乐晚会；在西德汉堡，举行过所謂“一无所有”的展覽会，展出一些空白画紙，当作艺术品，用一些不成形的泥团，当作雕塑品，放映只有黑白斑点的电影，等等。这些“新花样”的背后包藏着，恰恰是一些最沒落最反动最腐朽最墮落的东西。

我国宋代評論家呂祖謙說得好：“外观其辞，日新日巧”，“内观其实，日薄日頹！”^①看来，这句话也可以作为垂死的帝国主义的“新”“尊容”的写照。

① 呂祖謙：《东萊博議·楚子問鼎篇》。



历来的修正主义者，为了散布跟资产阶级妥协调和的思想，替自己的叛变行为辩护，也常常爱标榜“新”。远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所写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著作，就是以“探新”的面貌出现，说什么只要通过阶级调和，让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议会里携手合作，不需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使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伯恩斯坦把这一套叫做工人阶级的“新”道路。考茨基所提出来的修正主义的各种“新理论”，实质上也都是重弹资产阶级和伯恩斯坦之流的旧调。

修正主义者这一套挂着“新”招牌的陈腔滥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是从资产阶级字纸篓里拣来的，没有什么新奇。甚至伯恩斯坦的名句“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也是从资产阶级学者舒尔泽—赫维尔尼茨那里抄来的。他们跟在反动资产阶级教授学者后面，举起双手赞成“新康德主义”，赞成“新黑格尔主义”。他们高喊“回到康德那里去！”并且也像反动资产阶级教授学者一样，将黑格尔当做“死狗”来打，大喊大叫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妨碍对事物的一切合于逻辑的观察的圈套”^①，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一股脑儿地看作是经院哲学的残余加以否定，而他们自己却在宣扬比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的东西。

列宁对于修正主义者的整旧翻“新”的恶

劣行径，非常厌恶。早在一八九九年，列宁在《我们的纲领》等文章中，对伯恩斯坦及其追随者——俄国“经济派”的整旧翻“新”的勾当，作了极其猛烈的抨击。列宁说道：

“我们现在要问，那些纠集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伯恩斯坦周围大喊大叫要‘革新’这个理论的人，究竟对这个理论有什么新的贡献呢？**什么也没有**，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导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抓住一些零零碎碎的落后理论，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不倦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让步的理论。”^②

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同样也标榜他们那一套“理论”是“最新”的。他们把帝国主义国家看作是超阶级的东西，把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看作是“社会主义因素”，并且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已经“降至最低限度”，它们正在日益联合起来；这种论调，实质上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翻新，都是为着取消无产阶级革命。他们和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一样，宣扬只要通过议会斗争、通过社会改良，而不需要经过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就连

①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6页。

② 《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82页。



他们自吹为富有“创造性”的所谓“直接民主制”，也不过是老修正主义者的旧观点。这个所谓“直接民主制”，自称采取所谓“工人自治”的形式，企图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相对立；他们诽谤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把它诬蔑为“官僚主义”。而考茨基在一九一九年写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文中，恰恰也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企业的管理和委派企业领导人，诬蔑为“强加于工人”，是“独裁者的暴力”。

请看，几十年前的老修正主义者和今天的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调子，是多么合拍啊！

修正主义者把他们自己的旧货色标榜为新东西，把真正的新事物，诬蔑为已经过时的旧东西。老修正主义者叫嚣“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叫嚣“列宁主义过时了”！

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真理，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适应于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一个阶级——无产阶级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的新形势而出现的新思想，它同一切腐朽的、没落的旧思想立于对立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者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批判地审查和检验了人类思想史的全部遗产，因而使这种学说真正继承了以往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在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中，越来越显出其新的生命力，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不

断地被实践所证实而越来越生气勃勃。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在新的情况下会得到新的结论，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会改变的，它在实践中越来越证明其正确性。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要密切注意新环境、新情况，永远保持对新生事物的敏感，但是重要的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环境、新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做出正确的判断；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决不能对任何新情况做出正确的恰当的判断，不可能得出任何新的正确的结论。

修正主义者只是借口某些新情况，企图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事实上，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陈旧了”、“过时了”，而是这些老的和新的修正主义者自己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陷入了发着陈腐臭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泥坑里，把只能受到人民唾弃的肮脏的渣滓当做什么新鲜事物来玩赏。

善于区别新事物和旧事物，在新旧斗争中积极支持新事物的成长，这是革命者的经常任务。对于我们革命的人民来说，树立对新生事物必然胜利的坚韧不拔的信心，尤其重要。“真金不怕火来烧”。真正的新生事物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而那些自吹自擂为“新生事物”的旧东西，由于他们代表的是没落腐朽的力量，终究是要心劳日拙，遭到彻底失败的。



論 伯 恩 斯 坦 修 正 主 義

肖 述 馬 群 兵

在历史上，还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的学说这样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如此巨大的推动作用。今天，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占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且在全世界得到了愈来愈广泛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是在战斗中产生和发展的。在它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充满了对于资产阶级思潮和工人运动内部各种机会主义流派的斗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已战胜了其他一切思想体系，取得了统治地位。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趋向便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斗争的形式和原因已经改变，但是斗争还是继续着。”“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溃了。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的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①

步发展，预示着巴黎公社以后的“和平”年代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政治动荡和革命高潮即将来临。阶级斗争尖锐起来了。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宣扬阶级合作、社会改良的妥协路线的机会主义者之间的斗争，重新激化起来。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例如德国的伯恩斯坦派，法国的内閣主义派，英国的费边派，俄国的批评派，都联合起来，攻击所谓“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这个斗争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但它首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展开。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其代表人物就是伯恩斯坦。伯恩斯坦主义是当时帝国主义发展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同时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十九世纪下半期，德国工人阶级站在国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即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的时期。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4—15页。



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前列。一八七五年由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而统一起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下，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聚积和准备革命力量、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这个党从它合并的时候起，就在自己纲领（即《哥达纲领》）中对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作了原则性的让步。其后，在长期的和平、合法环境中，在这个党内，虽然曾个别地发生过“左”的倾向，但右倾机会主义始终是主要的实际存在的危险。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十九世纪末，它的工业资本的发展，迅速地超过了英国和法国。当时的德国帝国主义者强烈要求重新瓜分殖民地，极力推行掠夺殖民地的政策。在国内，德国的统治阶级在残酷迫害无产阶级的同时，也实行一些欺骗性的措施，收买工人上层分子，从内部瓦解工人运动。一八九〇年，统治阶级采取让步和怀柔的“新方针”，废除了一八七八年颁布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某些“改革”，党的合法活动的机会增长了。这样，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就活跃起来，他们认为政府的“新方针”是“对工人真正友好”，把反动统治者的怀柔欺骗看作是真正的“善意”，认为政府能够“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他们用这种观点肆意美化资产阶级的国家，散布只走和平道路、只走合法道路的幻想，而把任何谈论武装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人都诬蔑为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一八九一年恩格斯在批

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弗特纲领草案的时候，曾指出这个党在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当时党内有些领袖成为十足的“议会迷”，他们颂扬资产阶级民主，认为工人阶级只应当去从事各种细小的社会改良和经济改良。另一些党的领袖则对这种机会主义采取无原则的调和立场和纵容态度。这样，随着统治阶级策略的改变，随着党从事合法活动的可能性的增长，在第二国际处于领导地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终于逐渐形成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在理论上由伯恩斯坦主义最完全地表现出来。

爱德华·伯恩斯坦（1850—1932年）出身于德国一个铁路工程师的家庭，青年时代受到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影响，一八七二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但他并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在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之前，伯恩斯坦主张与机会

* 甚至当时党内的有威望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也发表这种论调。他向恩格斯解释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开和政府发生尖锐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会使社会民主党失去刚刚争得的合法地位。恩格斯坚决地驳斥了这种论调，他在1890年3月9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你痛斥以任何形式，在任何情况下使用武力，我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一则，任何敌人不会相信你这种说法，他们不致于蠢到这种程度；再则，根据你的理论，我和马克思也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我们从来不打算像善良的教友派信徒那样，如果有人想打我们的右脸，我们就把左脸也挨上去给人家打……”（参看叶·司徒潘诺娃著：《恩格斯传》，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0—221页）



主义的拉萨尔派妥协；后来他又成为杜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在“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颁布之后，伯恩斯坦认为这是“我们不大乖的行动给自己讨来的一条鞭子”，他离开德国，跑到瑞士苏黎世。在苏黎世他和赫希柏格、施拉姆合作办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这三个人一起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们宣称工人阶级不能靠自身的力量争得解放，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给工人造福的一切东西。文章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工人阶级只需关心最近的实际任务，只需“一站一站地”进行改良，而不必谈论什么最终目标，说什么“太高的要求”会吓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①这实际上就是后来伯恩斯坦所宣布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一公式的最初版本。马克思恩格斯严厉痛斥了这个“苏黎世三人团”，指出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参加工人运动，但并没有接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们在纸上承认阶级斗争，实际上害怕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所提出的道路无非是想用微小的改良来补缀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把这些“异己分子”清洗出党。^②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最后通牒式”的批评，迫使伯恩斯坦暂时收敛了一下他的机会主义活动。一八八一年他担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之后，在恩格斯监督下，为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贯彻革命路线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伯恩斯坦没有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一八八八年该报迁移到伦

敦后，他又醉心于英国的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费边社1884年成立，恩格斯称之为自由党的一个支派）。伯恩斯坦在以后的活动中，越来越暴露出他企图摆脱恩格斯的约束，摆脱恩格斯对他的影响。恩格斯非常注意伯恩斯坦的种种行为，在晚年他曾这样写道：“他（按：指伯恩斯坦）仍然没有做到他所应该做到的那个样子。他现在热中于琐碎的问题，而且越来越像他那位在《国民报》工作的英明的叔父了。”^③（按：伯恩斯坦的叔父是小资产阶级的《柏林国民报》编辑）

果然不错，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的态度就日益嚣张起来，他和福尔马尔、奥埃尔等机会主义领袖结成一伙，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进攻。从一八九六年起，他写了一系列“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要求“审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策略。一八九八年，他向党提出一个意见书，公然宣称这个意见书的论旨“在许多重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中所表示的见解”^{*}。一八九九年，他根据这个意见书写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这本书集当时的修正主义“理论”之大成，成为社会民主党右翼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在这个列宁称之为“叛卖变节的作品”中，伯

①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版，第479—486页。

③ 转引自叶·斯捷潘诺娃著：《恩格斯传》，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1页。

* 参看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版。以下引用伯恩斯坦言论，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参看此书。



恩斯坦为了隱蔽自己的背叛行为，竭力标榜他同恩格斯“有濃厚的个人友誼”，是受恩格斯“非常信賴”的人，把自己装成是“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他借口馬克思的学說远沒有完成，历史的发展又暴露了馬克思主义的“缺点和矛盾”，馬克思主义在許多方面已經“陈旧”、“过时”了。因此他提出不要把“老师的話永远重三倒四地反复着”，說“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发展与完成，必須以它的批判为第一步”。这样，伯恩斯坦就在“反教条主义”和“完成馬克思主义理論”的幌子下，全面地篡改馬克思主义。

二

伯恩斯坦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論证和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借口經驗是科学的基础，认为任何“主义”都不能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只是关于未来社会制度的一种学說，一种設想，一种傾向，工人运动本身并沒有“經驗”过，因此，它不可能是科学的。他說，馬克思的著作“希望成为科学的研究”，但同时又“預先确立了进化将招来的結果的公式”（指馬克思的社会革命学說，資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潰的学說），这是一种“空想論”或主观主义的表现。在伯恩斯坦看来，《共产党宣言》关于資本主义必然崩潰的論断是五十年前作出的，而后来“社会关系的尖銳化沒有按照《宣言》所描述的方式实现”，“那个論断，無論从哪一方面来看都錯誤了”。伯恩斯坦因此断定，馬克思学說的基础是不彻底的“二元論”，“看起来好像这个偉大的科

学精神終于做了教义的奴隶”。伯恩斯坦自称以“經驗”作根据，向“保守的傳統”、“教条”、“空想論”等等宣战，实际上是拿所謂“經驗”来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企图把馬克思主义說成是混杂着空想的东西。

在哲学上，伯恩斯坦提出用康德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他說：社会民主党“需要一个康德，他会十分犀利地批判那种傳統的教条”。同时，伯恩斯坦曲解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证法學說，硬說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沒有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辯证法，反而不知不觉地受了黑格尔的“概念的自我发展”的支配，用黑格尔辯证法的“命題来演繹地預断进化”。他攻击辯证法是馬克思学說中最致命的地方，是“妨碍对事物的一切合于邏輯的观察的圈套”。他认为社会只有逐漸的緩慢的进化，飞跃是不可能的，他說：“我确信，各民族发展上的重要时期是沒有飞跃的”。

在政治經濟学方面，伯恩斯坦以帝国主义初期的某些新材料，主要是銀行的新作用和卡特尔、托拉斯等組織的出現，来攻击馬克思对資本主义的科学分析。伯恩斯坦根据当时資本主义生产的某些发展，（工人特别是熟练工人实际工資的稍微增加，工人階級經濟和政治組織的发展，某些民主权利的取得，技术管理人員和知識分子等“中間階級”數目的增加等等，否定資本日益集中、大众日益貧困和日益无产階級化的事实，反对馬克思主义經濟学說的一切重要原理。他說，馬克思对于价值形成的学說“純粹是思維的构成物”，剩余价值是“基于假設的公式”。伯恩斯坦认为資本主义已經有了“防



止經濟危机”的手段，而且愈来愈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不适用了。

伯恩斯坦根据他上述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日益消除它内部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正愈来愈接近、愈来愈“相似”。他说，“我看见先进各国，无论何处，阶级斗争都采取比较温和的形态”，“阶级斗争本身具有愈来愈文明的形式”^①。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这个理论不适用于“真正民主”的社会。他说：“有着严格等级制的封建制度，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得不用暴力来破坏。近代社会的各种自由制度，正是在它们具有伸缩能力、变形能力和进化能力这一点上同封建时代的制度迥然不同。因此这些制度不应加以破坏，而应使之继续进化。”很显然，伯恩斯坦的这种说法是要求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伯恩斯坦竭力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否认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暴力机器。德国党在一八九八年选举中获得的二百一十多万张选票和五十六个国会席位，成了伯恩斯坦颂扬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的证据。他说，普选权已经使“民主即使实际上还没有消灭阶级，但在原则上已经意味着阶级统治的消灭”，议会制民主“必然会导致消除资本主义的垄断，或导致除去它们的资本主义性质”^②。所以他认为，议会制是实现无产阶级要求的“最有效手段”，社会民主党要“以普遍选举权和民主为基础”，力争获得大多数选票，争取在国会占得多数，以便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否则就没有更好

的促进事业实现的途径”。

伯恩斯坦掩盖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实质，美化资产阶级民主制，自然也就谈不到引导无产阶级把目标集中在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上，相反，他要求保存这个机器并使之“完善化”。列宁说：“伯恩斯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③伯恩斯坦口头上有时也谈几句要求革命和夺取政权之类的话，仿佛他还是一个“革命者”，但这只是为了欺骗群众，实际上他所要证明的是，革命和夺取政权是完全不必要的。他认为对于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应一般地实行暴力的剥夺，而应通过组织和法律实行渐进的赎买”。

伯恩斯坦坚决反对革命的暴力——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把革命的暴力、革命的剥夺咒骂为“布朗基主义”，“无谓的生存牺牲”。他说：“在过于重视革命暴力对近世社会之社会主义的变革的创造力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从未完全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观点。”还说：“《共产党宣言》之革命的纲领，彻头彻尾是布朗基主义的。”他

^{①②} 伯恩斯坦：《什么是社会主义》，译自1922年德文修订版。

^③ 《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9页。



认为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只需要和平地、有秩序地改革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现代各国的政治组织越是民主化,政治大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便越是减少。”在有了议会制、普选权这类东西之后,再谈论什么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就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他解释说:“这不是因为我满意了,我渴望安静,而是因为我相信伟大的成就已经取得,工人阶级自身有武器,这种武器可以和古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基米得下述这句话媲美,他曾说:‘给我一个立足的地方,我就要把世界翻过来’。工人阶级也可以说:‘给我普遍、平等的选举权,那末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①

伯恩斯坦还以军事技术的进步为借口,认为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已经不再可能。为了证明这一点,伯恩斯坦恶意地歪曲恩格斯曾经提出过的关于军事技术的发展给城市街垒战带来更大困难的一段话。恩格斯自己指出,他“推荐这个策略仅仅是为了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很多附带条件。”“就是对于德国,明天这个策略也可能成为不能接受的了。”对于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断章取义地歪曲他的论点,恩格斯早就提出过强硬的抗议,说他们从他的著作中引证了凡是能为“无论如何是和平的而非暴力的策略辩护的东西”^②,并且企图把他描绘成仿佛是“一个不惜任何代价乞求和平、遵守法律的人”^③。伯恩斯坦不顾恩格斯的这些说明和抗议,硬把事情说成仿佛是恩格斯已经放弃了暴力革命的观点。他企图以恩格斯的名义来为自己的反对暴力革命的机会主义辩

护。他说:“在一个世代之前,人民群众保卫自己权利的最后手段是街垒战斗。这种手段已经由于现代城市建筑和现代枪炮技术而失去效用了。”^④伯恩斯坦还用资产阶级的武力来吓唬工人阶级,说“和军队的大规模冲突,是妨碍社会民主党不断发展甚至是使它暂时退步的手段。”

伯恩斯坦因为害怕革命进而害怕无产阶级举行总罢工,他认为“发动一次总罢工,很可能也就是引起一次流血的革命”^⑤。他只要一点一滴的、平静的、不“触动任何人一根头发”的改良,认为这种微小的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所以他认为,应当提倡在保存资本主义基础的前提下,组织工人的合作社,实现所谓工业的“社会化”,争取更“正确”的“公平分配”,以及制定“城市交通政策”、“住宅政策”、“市政工人政策”等等,要求工人阶级放弃政治斗争,去从事这些微不足道的经济改良。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之点,历来是机会主义者所竭力回避的。伯恩斯坦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并且竭力把它丑化。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时候,是把法国革命的恐怖时代当作典型的实

① 《什么是社会主义》,译自1922年德文修订版。

② 《恩格斯致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0页。

③ 《恩格斯致考茨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95页。

④⑤ 《政治性的群众罢工》,译自1905年德文版。



例的”。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词在今天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他断言无论从经济的发展或知识水平来看，无产阶级都还不能“实行政治的单独统治”，如果无产阶级过早地夺取政权，则无产阶级的专政只是“意味着俱乐部的演说家和著作家的专政”。伯恩斯坦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广大人民正是实现最广泛的民主，而特别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的强力统治，说这是“恐怖的独裁政治”，“只有除去专政这一名词的事实上的意义，而赋予它以某种稍微缓和的意义，它才能同现实相一致。”

伯恩斯坦既然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要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他否认党的领导作用，歪曲党的根本性质。早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中，他就攻击所谓“片面的”工人阶级政党，鼓吹应该有一个可以容纳“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他认为，党是“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经济斗争而成立的组织”^①，党只应该从事经济斗争，不必进行革命的政治斗争。他要求党“抱定决心不去煽动任何暴力的冲突”，主张党应当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党，和平主义的党。他说：“如果社会民主党毅然决然地抛弃事实上已经过时的口号，而按照它今天的本来面目以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的姿态出现，那么它的影响定会远较今天更为强大。”

作为帝国主义发展的产物的伯恩斯坦主义，对内主张“阶级合作”，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对外则支持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伯恩斯坦硬把他的民族

主义说成是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尽管伯恩斯坦时常断章取义地摘引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片言只语，但他的露骨的沙文主义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当问题不再停留在理论的范围而直接关系到具体政策的时候，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

伯恩斯坦认为“国际主义在今天还过于辽远，而似乎是属于未来时代的东西。”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他表面上虽不敢反对，实际上是完全不同意的。每当问题涉及到德意志民族对外关系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他说：“国家是整个民族的连接者，是巨大的共同利益的捍卫者，就国家的这一职能来说，工人和国家是一致的。”^②因此，无产阶级对于德意志帝国的“利害关系不能漠不关心”。伯恩斯坦故意混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界限，他竟说：“维护本国利益究竟到什么程度就不再是合理的并且转变成伪爱国主义，要定出这样的界限是很困难的”！

• 伯恩斯坦积极赞助德国的殖民政策。他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对德意志帝国的殖民政策是完全没有忧惧的必要的”，“不存在从一开始就把获得殖民地看做是应当深恶痛绝的事”。马克思恩格斯认定，民族压迫是阶级压迫的一种表现，压迫别的民族的民族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伯恩斯坦却认为，侵略和掠夺落后国家的殖民政策，既可以帮助

①② 《什么是社会主义》，译自1922年德文版。



三

“开发”落后国家，又可以促进帝国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积累得愈多，社会主义到来就愈快。他为这种殖民政策辩护说：“欧洲人占领热带国家，并不是一定会妨碍土人的生活上的享乐，而且这样的情况从来也不是经常的。”

一八九七年，德国帝国主义强占了中国的胶州湾。这个伯恩斯坦，首先表示不完全同意社会主义报刊对德国帝国主义的谴责，认为“取得胶州湾并不是德国外交政策上最坏的一手”，继而又说：“只要租借胶州湾过去和现在都只是为了使德国在中国的将来利益获得保障；那末社会民主党也就可以赞成这种做法，而不会丝毫损害自己的原则。”这充分表明了伯恩斯坦的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表明了他是帝国主义的忠实的辩护人。

伯恩斯坦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思想发展的最后结果，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站到了“保卫祖国”的立场，要求本国无产阶级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去残杀自己的阶级兄弟——别国的无产阶级。战争一开始，德国的修正主义者同德国资产阶级代表一起，在议会中投票赞成用于战争的拨款。伯恩斯坦无耻地把这种背叛行为说成是“德国人民的代表也就这样向敌国显示出一条统一战线”^①。伯恩斯坦完完全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难怪列宁把这种最露骨的沙文主义称为“社会帝国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伯恩斯坦这一套修正主义理论实质上是什么东西呢？尽管他自吹是“从社会现象的探究而得来的观点”，标榜所谓“新原理”、“新见解”，但实际上丝毫没有什么新东西。列宁说得好：“这个派别，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②，是“内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③。伯恩斯坦主义是偷运到工人运动中来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由于它具有社会主义的假面具，它就成为更巧妙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工具。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全世界资产阶级对他的交口称赞。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凶恶的敌人纳乌曼在《救济》杂志上写道：伯恩斯坦批判马克思主义，“他批判得很好，很巧妙，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他批判的。如果是我们批判的，那末这就是‘敌人’批判的，但如果这是他批判的，那末就是‘同志’批判的。”资产阶级从伯恩斯坦主义中认识到自己的深切利益，他们把伯恩斯坦当作一个救世主来欢迎，极力推荐他的著作。沙皇政府的警察局长祖巴托夫在血腥镇压无产阶级一切

① 《工人阶级国际和欧洲战争》，译自1905年德文版。

② 《怎么办？》。《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19页。

③ 《马克思学说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83页。



“越軌”行动的时候，也特意把伯恩斯坦的著作作为“工人讀物”，殷勤地推荐给俄国工人阶级。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傾机会主义的根源，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强烈影响。当时的和平环境和工人运动在合法斗争中获得的成績，使大批知識分子涌进工人运动，他們用各种各样方式在工人运动中傳播资产阶级思想，宣揚奴顏婢膝、馴良、柔弱和无骨气等庸俗习气。正在发展和向外擴張的德国资产阶级，用一部分超额利潤和祿位来收买工人上层分子，腐化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懂得，利用工人上层分子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比自己亲自出馬更为方便，更有成效。资产阶级所培植起来的一个享有高薪和特权的“工人貴族”阶层，在經濟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已經基本一致；他們的立場、观点、思想感情以至生活方式，也已资产阶级化了。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这批“工人貴族”千方百计为资产阶级效劳，他們和他們的主子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企图使工人阶级放棄社会主义革命，丢掉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就是直接反映了这种“联合”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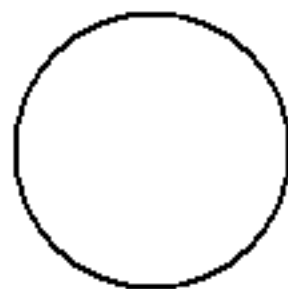
在伯恩斯坦主义出現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許多領袖虽然表示不同意，但是由于他們自己实际上采取了右傾机会主义立場，所以他們对于伯恩斯坦主义的批評是軟弱无力的。正像伯恩斯坦自己說的那样：他們虽然“对我提出了責难”，但实际上“他們自己就是这样行动的”。曾經在哲学上对伯恩斯坦主

义作了坚决斗争的普列汉諾夫，在一八九八年写信給考茨基說：“今天的問題就是誰埋葬誰的問題：是伯恩斯坦埋葬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斯坦？”^①但考茨基仍多方庇护甚至“感謝”伯恩斯坦。后来考茨基虽然参加了对伯恩斯坦的批判，但他迴避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問題。由于他主張与伯恩斯坦調和，結果也完全演到修正主义方面去了。

当时德国和国际的有些革命的馬克思主义者虽然对伯恩斯坦主义作了一些斗争，但对其危险性也曾估計不足。拉法格认为伯恩斯坦对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过是“理智疲劳过度”的結果。威廉·李卜克内西則說伯恩斯坦主义是智力发展的过程，可以不去理睬它。梅林則认为修正主义决不是工人运动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所产生的，“除了修正主义的情緒外，在德国从来没有存在过修正主义。”普列汉諾夫也沒有能够把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坚持到底。

列宁在当时是捍卫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偉大旗手。从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本书出版以后，列宁就給了伯恩斯坦主义、首先是它在俄国的变种——“合法馬克思主义”、經濟派以严厉的批評。此后在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沙文主义和俄国的孟什維克、取消派的斗争中，列宁团结各国革命的馬克思

^① 普列汉諾夫：《我們为什么應該感謝他？》，《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38頁。



主义者，对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批判，并在当时条件下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在一个时期表现得十分嚣张。它不仅是德国一国的现象，而且是一种国际现象，它在许多国家的党、工会、合作社、议会党团内占据着统治地位；它不只是党的少数右派领袖的问题，而且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它不仅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而且在实践中贯彻其改良主义的路线；还有帝国主义作为它的靠山。但是，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科学分析，确信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尖锐化，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正在成熟，广大劳动群众是要求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群众的这种革命意志迟早会得到实现，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所以列宁在斗争中满怀信心，坚定不移，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立场是唯一正确的立场，而修正主义最后必定失败。

列宁指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市侩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①后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完全证实了列宁的这个论断。伯恩斯坦修正主义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 * *

列宁经常指出，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仍然存在，帝国主义仍然存在，修

正主义就还有它的基础。伯恩斯坦主义是破产了，但它还会在不同的条件下继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表现出来。

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就是伯恩斯坦主义的现代版。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获得了更大更辉煌的胜利，社会主义的理想已经成为伟大的现实，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的新伯恩斯坦主义，要比它的前辈表现得更加凶恶、更加卑劣、更加狡猾，但它们在根本点上没有什么不同的。新伯恩斯坦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一样，在哲学上用诡辩论代替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为垄断资本辩护，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主张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美化资产阶级专政，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歪曲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否认党的领导作用；以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新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反映了当前国际范围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尖锐化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必须坚决反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在当前东风压倒西风的有利的形势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在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在斗争中获得更为蓬勃的发展。

^①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页。





在毛主席身边 (人民美术出版社供稿)

刘文西

